

前言

我们是没有党史专家那么多科研经费，也没那么多闲情逸致，更没那么多机密材料。于是乎我们只能下些免费材料，利用空余时间，看点官方出版物，来扯一扯仲尼先生的搅屎功绩。我们不矫情，官方党史照看不误。我们要说，官方党史出得越来越好了，至少材料越来越多了，历史经过的描述越来越详细了。这就是好事嘛。语焉不详，掐头去尾的事依然照做，但至少比之前要好了。我们认为，这种程度的叙述，对我们来说已经基本足够了。我们完全可以和专家们在基本事实的认定上达成一致，而且正是要首先在这方面达成一致。但同时，我们和专家们对同一事实给出完全对立的评价。这是由我们和专家在屁股上的对立所决定的。我们对专家们的脑袋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从来不会矫情地去怀疑丫们的智商。因此，官方文本我们拿来就用了，只是用我们自己的立场去分析解读而已。

我们看仲尼搅屎，就看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苦逼没钱，就不奢谈啥版权意识了，网上多的是免费电子版，拿来就看。我们看的，主要是仲尼在建国后的搅屎记录。更确切地说，是所谓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后，也就是一九五三年之后。因此，我们下面所引的材料原文，都出自《周恩来传》第三卷和第四卷。

还是那句话：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我们看仲尼搅屎，当然是看他如何具体地搅社会主义的屎，搅无产阶级的屎。同时也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对这种搅屎活动进行斗争。我们看历史，就是要分析成败得失，汲取历史教训，提高阶级觉悟，服务于我们当下的以及未来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去读，代入进去读。空头搞制度设计神马的，当然是毫无益处的；但总结历史经验，少走些弯路，多攒些想法，是完全有必要，而且有好处的。

老龟命们说，仲尼是伟大的救星；左逼们说，仲尼是完美的圣人；老板们说，仲尼是仗义的大哥；洋逼们说，仲尼是友好的伙伴。我们说，仲尼是搅屎资逼中的战斗机。口说无凭，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仲尼搅屎录。

第一章 经济建设问题

按：抗美援朝胜利在望，新中国正式开始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进度不慢，成绩不小，一派欣欣向荣，生活蒸蒸日上。值此佳时，仲尼们推出了税制改革，大有搞活私营经济，使多种所有制企业携手并进的气象。仲尼这是在号召走和平竞争，共同富裕的道路，无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说，仲尼大哥是伟大的先行者，邓挫小弟是忠实的继承者。大哥未竟的事业，小弟将超额完成。

由于对建设工作缺乏经验而产生贪多冒进的偏向，摊子铺得过大；财政收入却不能有相应的增加，而且在制定年度预算时在收入上有虚假现象，把上一年的财政结余四十多万亿元（这是指旧人民币，相当于新人民币四十多亿元——编者注）打了进，事实上这笔钱已存入银行变成信贷资金，被银行贷出去了。这样，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二十一万五千亿元的赤字。

（先来欣赏一下财经委员会的这个低级错误，来做个引子。关键是，这样的低级错误犯了还不止一次！）

当时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道：“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

成为会议中心问题的“新税制”是怎么一回事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务院在一九五〇年初曾颁布《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当时的税收制度是在旧税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难免残留旧税制对经济的某些消极作用，主要是各税重复、零星分散、手续烦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组，这种消极作用日益显露出来，因此修正税制是需要的。在修订时还遇到一个问题：过去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税法对它们作了些优惠的特殊规定。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为了迎接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需要增加税收，支援建设。恰好在这一年，不少私营企业在五反运动后漏税要补，偷税要罚。有些人有消极情绪，甚至实行怠工或躺倒不干。如果过多把税收增加在他们头上，会把私营企业挤垮，国家面临的困难将更多。因此，财政部考虑在修订税制时改变对国营和合作社经济原有的某些优惠规定。

根据几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十二月二十六日，政务会议讨论并批准这个方案。对改变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某些优待，周恩来作了说明：“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社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对私营企业，他提出了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接着，财经部门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意见。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发表社论。

（如果说误算收入导致赤字的问题是技术性失误的话，新税制就完全是屁股问题了。不只是薄一波的屁股问题，仲尼也是鲜明地支持这个税制，并且积极准备往下推的。神马重复问题，零星分散问题，手续繁琐问题，本来只是技术问题。重复的税去掉重复的，零星分散的集中统一起来，手续繁琐进行简化就好了。这根本就不是神马制度问题嘛。但是新税制一出，根本没有提怎么去除重复税种、集中统一税收、简化手续，而直接把税制改成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给改掉了，对于私营企业则是百般照顾。神马“过多把税收增加在他们头上，会把私营企业挤垮”。该缴的税本来就要缴，更何况私营企业垮就垮了，这不正促使国营企业加快发展么？合着还要给资本家出好政策，求着丫们剥削工人？这个屁股完全坐在了老板一边嘛。仲尼的说法极其可笑，说神马取消对国营企业、合作社的税收优待，政策偏向私营企业，有助于给国营企业、合作社施加压力，促使其更好发展。拜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搞竞争，争神马呢？社会主义建设，本就是要搞多搞快国营，没收改造私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嘛。有优待，和单靠优待也根本不是一回事嘛。在优待的前提下更快更好地发展不是很好嘛？如虎添翼不要，非搞身残志坚？仲尼的这一套，难道不正是被邓挫毫无保留地继承下来，并变本加厉地用到改开中来么？只是仲尼要搞，还得过老毛这一关；至于邓挫，那根本是如入无人之境了。对于老板们，仲尼只是“号召”缴税。还搞出个一荣一耻：以纳税为荣，以漏税为耻。纳税的

老板是好老板，漏税的老板是坏老板；支持好老板，反对坏老板。仲尼可真是老板们的知心人，大救星啊。老毛这个坏蛋，搞得老板们日子很难过，利润这么少，还要交税，还不能打罚工人，这还当个鸟的老板，不干了！仲尼出来说，老板朋友们，大家不要慌，都是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嘛，我们不会亏待你们的，你们好好纳税，利润还是留给你们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和气生财嘛。更搞笑的是，出台新税制这么重大的决定竟然不上报中央，开会通过，而是跑去向“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意见。这简直可以算是跪舔老板了。同时目无组织，目无中央，跪舔完老板之后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鸟。怎么看都不是神马认识错误问题，工作失误问题，而就是妥妥的屁股问题。）

修正税制在工作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严重问题。陈云曾指出：“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变更纳税环节中的毛病主要在：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而给批发商免了税。当时，批发商中私商经营的比重还很大，这就打击了国营商业和一些内地工业。在执行中，由于私营商业往往是批发兼营零售，两者难以划分，加上工作跟不上去，工厂出厂价没有及时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私营批发商占了便宜。“公私一律”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了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原稿上有这样一句话：“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薄一波在修改时，把这句话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陈云九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报告时说：“‘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连左逼陈云都看得出来，新税制的屎实在是太明显了。陈云脑瓜子飞转，琢磨着还是先和薄一波这个猪队友保持一下距离吧。不过，陈云到底是左逼。小骂，到底也还是大帮忙。左逼一双眼只盯着所有制。所有制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只谈所有制是远远不够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系统，工人必须要全面占据生产

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左逼们认陈云，就因为陈云提公有制。丫们不知道，资产阶级也可以搞公有制滴。丫们更不知道，即便是无专政下的国营企业，也要看内部的生产关系，看工人在生产中所处地位滴。抽象地提公有制，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之间自由切换，就可以在由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向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反革命转化中无缝对接。左逼们不正是这么干的么？丫们不正是这么忽悠无产苦逼去保卫国企，乃至保党救国的么？国字号的玩意儿，不正是左逼们施在无产苦逼头上的紧箍咒么？）

新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波动，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预料到的物价上涨和思想混乱。山东分局向明等和北京市委先后写信给中央，反映这些情况。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严厉批评这件事说：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并说：“此事我看报始知。”

（新税制物价当然要上涨了。国营厂委屈啊：凭啥我交了利润，还要交税收，我当然要涨价。私商说这是国营工厂涨价，我也得涨，不是公私一律么？要维持平均利润率嘛，国营厂加价，我也得加。

解决物价上涨，意味着要做什么呢？1、要求大生产必须从速抢占阵地，要求阶级力量必须有重大变动。只有扩大生产，物价才有可能下跌；2、要求从速抢占流通阵地，跟私商抢地盘。用强大的生产，用广阔的流通渠道，击垮小生产者，击垮私商。但事实上仲尼为首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措施恰恰相反的，代表他们阶级的这些措施加剧了物价上涨。

其次，这么大的决策，国家一把手竟然是看报之后才得知！至于老毛说匆率发表，毫无准备，这就不对了。人家明明是充分考虑，并且征求了“工商界知名人士”的意见，开过听证会了的。考虑这么周全，怎么能说是毫无准备呢？可见老毛一句顶不了一万句，阶级利益斗争嘛，先干了再说，等着发许可证，黄花菜都凉了，这一点仲尼们清楚得很。事后表个态，以后注意。那就接着抗毛旗嘛，幌子谁都会打。仲尼们可都是打着老毛的旗子做事哦。）

毛泽东又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月十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其中规定：“今后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

（老毛毫不客气，什么私营企业，就是资本家嘛！资本家拍手叫好的玩意儿，能是好玩儿吗？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对无产阶级不利嘛。这是根本问题。仲尼对这一点一言不发，只是搞了个组织程序方面的补救措施。丫们心理清楚得很，组织程序麻烦些，那是效率问题，更何况斗争得法，程序也可以为我所用。路线问题，那就碰不得，改不得了。放弃阶级利益？仲尼们可没这么脑残。）

不仅对薄一波批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把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刘少奇和周恩来。薄一波后来说：“我当时在思想上产生了这样疑问：会议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的串联造成的。”

（没有刘周的支持，薄能凭一己之力推这么大的政策？丫有这个胆吗？仲尼难道没有站出来明确表示支持？丫们难道不是一起研究并决定的？丫们不是一起征求了工商界知名人士的意见？难道不应该把矛盾指向刘周？高岗同志把矛头指向刘周，难道不正是阶级斗争意识高度敏锐的表现么？修养在东北干了些啥，高岗可是清楚的很。不串联，难道单打独斗？刘周邓薄们穿一条裤子，集体作战，那么和他们斗争，自然也要抱团嘛。干不过，那是力量没到，败了就败了，找机会再来就是。高岗同志到底没有周邓们老练，没有他们能屈能伸，能上能下。跟丫们作战，可千万不能有啥面子，自尊，道德，抱怨，等等诸如此类的包袱。关键时刻，这些玩意儿可是要命的。）

陈云、邓小平在会上都发了言。陈云针对会上提出的问题，明确地表示：“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邓小平在会上说：薄一波同志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

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高饶猛攻，陈邓立马站队，左逼陈前面的小骂这时露出了大帮忙的本相。邓挫本就是唱红脸的，这时当然更要坚决表态。表面上维护薄，实际上是替整个资集团说话：不管以前我们犯神马错误，以后犯神马错误，那都不是路线错误！还有比这更赤裸裸的狡辩吗？没有坚实的阶级力量做后盾，能说出这样的话吗？丫们难道不是已经明目张胆地抱作一团了？丫们抱团就叫有团结意识，高饶串联就叫分裂党？貌似一团和气的党中央，难道不正是在为不同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分裂了吗？丫们的斗争，不正是整个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在党内高层的反映么？老毛一句要团结，不要分裂，就能取消阶级对立，弥合阶级矛盾？）

结论指出：“由于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仲尼做结论，老毛和稀泥。在资集团强大的攻势下，老毛妥协了。这表明，此时在党内无先锋处于劣势。但正是因为处于劣势，才更要坚决斗争。老毛在经济战线的阶级斗争刚出现时候，退缩了，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手软了，甚至和稀泥，把明明是两个阶级路线的斗争，调和成一个阶级内的不同认识的冲突。这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继续把持中央经济政策的权力留下了巨大的漏洞。资代表集团操纵的税制改革实际上就是继续强化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目标对抗，如此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怎么不是路线对立？

仲尼们可不领老毛的情。阶级利益前面，神马都得让位。这一点仲尼们清醒的很。老毛和稀泥的后果是，在资产阶级代表缓过劲之后，立马以企图篡夺中央权力为由，成功的把矛头指向了尖锐对待税制改革问题的高岗。丫们对待高岗，就不再是批评几句那么简单了，而是要开除党籍，一撸到底，永世不得翻身。）

纵观新税制事件，就是资和无的激烈阶级斗争过程。刘周站台，薄出面，邓唱红脸，陈唱白脸，拉上老板们做群众基础，气势逼人。老毛发现之后立即迎头

痛击，但虎头蛇尾，没有追根究底，而是和稀泥了事。高饶跟上，直逼刘周，仲尼们人多势众，斗争得法，一个回马枪把高饶干翻在地。双方围绕税制为谁服务展开斗争，而实际所争的是道路问题，是走资还是走社的问题。这背后无不是阶级屁股、阶级利益使然。刘周新税制虽然没搞成，而且挨了批评。但随后果断将高饶拿下，折损了无先锋队的力量。可见斗争双方都很清楚彼此的对立。阶级斗争不是口号，而就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现实活动。有利益冲突，有矛盾，就必然有斗争。走资还是走社，这在一开始便成为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阶级斗争一开始便已是异常激烈了。左逼们以为资无之间的阶级斗争只到了文革才有的，右逼们则干脆转头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而把斗争庸俗化为宫廷权斗。但我们只要带着鲜明的立场去看，就能看到新税制事件中尖锐的阶级矛盾，激烈的阶级斗争。老毛和稀泥的后果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能超脱于阶级斗争之上，不管他是谁。左逼们意淫老毛是大神，能够掌控阶级斗争，不偏不倚。右逼们幻想老毛是恶魔，随时操纵权力斗争，从中渔利。于是，我们看到，左逼右逼走到了一起。老毛只能选择站队，当他选择和稀泥的时候，客观上就已经站到资一边了；资可一点都不心慈手软，而是瞅准时机，置人死地。

坚持斗争，能屈能伸；心狠手辣，斩草除根。向仲尼学习！

第二章 如何对待知识分子

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一直是建国以后的一个重大问题。尤其从五五年开始，到六二年，资无双方一直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虽然更激烈的斗争发生在文革时期，但自建国开始，这个矛盾便一直存在，斗争也一直存在。老毛一开始没有特别注意，还是认为知识分子们可以改造，高知们可以经改造后为无服务。因此在对待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知上，老毛一开始是比较温和的。这个判断不仅让仲尼们占了先机，培养自己的阶级基础；也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搅屎空间。当然，战斗的根本，还是在于双方的阶级力量。但力量本身，也是从战斗中积累起来的。文革的问题我们将会专门的讨论。下面要看看五五年到六二年资无如何围绕知识分子问题展开斗争。不过《周恩来传》有个问题。书里对仲尼如何搅屎（书里当然认为是功绩）讲得比较详细，但对无如何反击却写得很少。按书中所表，在这个问题上，无出手很慢，行动迟缓，动作也

不多。而且基本没有对仲尼们构成打击。无具体如何反击，待有更详实的屎料，再做补充。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年初就有过要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想法的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并且陈述了他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他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

“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进行商讨，决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即将开始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日期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仲尼看到知识分子们日子不舒坦，各种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来，咱们替仲尼编一段说唱：

哟哟，切克闹。

哟，知识分子们，受到信任不够；

哟，享受的，待遇很糟；

哟，所处的，职位太低；

哟，新中国，愧对知识分子；

哟，这些都是，对知识分子，的伤害；

哟，我仲尼，很忧虑；

哟，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

哟，要不然，新中国，危在旦夕。

哟，哟，这还了得。

哟，哟，赶快解决。

哟哟，切克闹，再来一遍。

嘿嘿，说唱完毕，看看仲尼的思路：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政协是个神马玩意儿？这就是个大屎坑，汇聚各路乡绅贤达、红色老板、民主人士、党外高知，无时无刻不散发出浓浓臭味。还是仲尼们当初的桶蘸搞得

好啊，阶级基础深厚。要不然就这帮货，非但寸功未有，还各种搅屎，如何能在新中国议席上占那么多坑？到政协上讨论这个问题，仲尼真是聪明。然而老毛并没有这么愚蠢，而是表示先在党内讨论。是嘛，既然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拿去政协讨论算怎么回事？仲尼的小九九没有得逞。不过，仲尼表示不要紧，党内俺也有人。于是就有了十人小组，大伙请看：彭真，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人民革命军政协副主席；李维汉，统战部长；徐冰，北京副市长、统战部副部长；张际春，中宣部副部长；安子文，人事部长；周扬，中宣部、文化部副部长；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钱俊瑞，教育部、文化部副部长。这十位，在后面的反右运动中也有精彩表现。当然，在文革中都受到了早饭派，尤其是四人帮的迫害。有的在文革结束前就挂了。撑到文革结束的，无一不对文革深恶痛绝，对四人帮大加挞伐，对改革开放歌功颂德，为改开事业鞠躬尽瘁。有了这十位干将，仲尼自然底气十足了。）

应当以什么标准去衡量知识分子，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估计知识分子现状的关键。周恩来明确地回答说：“在政治思想方面，对于知识分子衡量的标准，首先应该是爱国主义，其次才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马克思主义。”

（爱国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资本家也爱国的。可不是么？在仲尼看来，准时足额缴税的老板就是好老板，就是爱国的；偷税漏税的老板是坏老板，是不爱国的。前面“税制改革”一文里已经说过，仲尼甚至认为要免去坏老板的一部分罚款，不然的话，淫家就要破产鸟，甩手不干鸟，国家就要遭殃鸟，工人就没有饭碗鸟。谁养活谁？仲尼先生的言外之意不是很清楚么？在仲尼看来，政治思想方面首要的竟然不是无产阶级立场，而是神马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竟然不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是神马模糊不清的世界观！用爱国来搅屎，大伙看看，现在的左逼大湿们不都是这样么？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搅屎幌子反复出现在仲尼的表演中。）

细致周密的调查，使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得出重要的结论。十二月十六日，由他主持起草并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征求意见。这个《指示（草案）》明确地写道：“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

（仲尼表示，高知们都爱国，都加入劳动人民的队伍中了。高知们的政治立场是可靠的。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看人了。这样是不对滴。）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我们必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尽可能迅速地脱离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仲尼表示，高知们作用大大滴，没有高知们的积极参加，我们的科学文化技术就要原地踏步，就无法脱离落后状态，就无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结合上一条可知，仲尼认为，高知们立场可靠，技术过硬，又红又专，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头羊。）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在作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极其重要论断的基础上，把报告的重心放在阐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上，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考虑和规划上。

（准备就绪，正式扔出重磅炸弹。还是从立场和技术两方面来肯定高知。）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

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

“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多么熟悉的话语！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这不正是伟大的设计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么？设计师真是没有创意，说来说去都是拾了仲尼先生的牙慧。在洋洋洒洒的报告中，我们看不到阶级矛盾，看不到生产关系，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哦，对，仲尼认为高知也是工人阶级，既然科学技术是决定性的，而只有高知掌握科学技术，因此也可以说由于高知被划入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便起了决定性作用鸟！工人兄弟们，我们可真得感谢高知们，没有高知们的加入，我们可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咧。）

周恩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他在上述那次讲话中说：我国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现状“比抗战时期好……但是比抗战前差”“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其中有特殊贡献者的工资还可以超过国家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直接抓。”在他的督促下，这年六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有了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二百五十三元提高到三百四十五元，增资幅度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四。

（素来公知多果粉，看来必然也得是周粉了。抗战前知识分子过的是神马日子？那可真是逍遥自在、丰衣足食、花街柳巷、歌舞升平。提提笔杆子、动动嘴皮子，银子滚滚而来。抗战时期？那真是苦了知识分子们咯，也就比工农兵稍好一些了。什么，工农兵？怎么能把知识分子和这些卖苦力的相提并论呢？！卖苦力的就是要过苦日子的嘛。知识分子何等尊贵，看看现在过的神马日子？！仲尼们搞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就说了：

“全国解放以后，知识分子虽然有公费医疗等各种福利，但是与过去相比，他们的工资待遇还是低得很多。比如抗战前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是 600 元，可以

折合人民币 1500 元，现在的最高工资只有 252.6 元。抗战前副教授的最高工资是 360 元，折合人民币 900 元，现在只有 197 元。其它领域的知识分子与大学教师的情况相似。在文艺界，电影演员赵丹 1936 年的月工资是 180 元，折合人民币 450 元，如今的工资只有 220 元。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大约等于抗日战争之前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考虑到物价因素，中国从 1955 年的生活水平可能要比抗日战争前降低十来倍甚至更多。”

降低十来倍甚至更多，这不是明摆着迫害知识分子么？！打跑了蒋介石，咋日子反倒不如以前了呢？仲尼表示，这种情况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一定要让知识分子过上民国时期的好日子。工资一定要涨，待遇一定要提，这个事不一般，仲尼表态“由中央直接抓”。仲尼可不来虚的，说涨就涨，说提就提。不只是涨工资，有贡献的还要各种奖励。等等，涨工资前，叫兽二百五多，副叫兽将近二百，大戏子二百多。我们不知道，拿几十块工资的工人兄弟们看到这段话有神马感想。我们勒紧裤腰带，却发现丫们穿着金腰带。丫们动动嘴皮，提提笔杆就能拿那么多钱，还唧唧歪歪，跟受了多大罪似的。就这能和咱们工人们尿到一个壶里，那才奇了怪了。我们若是当时的一个普通工人，难道不立刻脑中万头草泥马奔涌而过？看来真不能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一抬头，才看到就是这帮家伙坐在车上吃香喝辣，时不时还骂日子不好过，还埋怨过得憋屈，还老是提民国那会儿日子多好。难道我们不该把丫们从车上揪下来痛扁一顿，让丫们拉车去么？仲尼这一调查，反倒让工人们看到这么鲜明的差距，这么严重的对立，这难道不正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么？养着这帮子人，对工人到底有啥好处？仲尼不是说丫们有觉悟，是工人阶级一分子么？何以丫们就不老老实实参加生产，拿工人的工资？仲尼又扯皮说干活需要物质刺激，丫咋不物质刺激一下普通工人，却老是给工人们撒各种画饼？当我们要揭高知的屁股时，仲尼就忙不迭地给他们罩上工人阶级的铁布衫；当我们要亮高知的待遇时，仲尼就急匆匆地给他们戴上高级物种的金帽子。知识分子们忍不住要欢呼又一个黄金时代的来临，而这个时代的开创者，就是伟大的周仲尼先生。哎？这个呼声肿么这么耳熟？哦，对，几十年前，伟大的设计师一声令下，知识分子们又迎来了一个春天。设计师啊设计师，能不能别老是照搬你哥的套路，能不能有点新意？）

（很遗憾，仲尼对高知们的厚爱并没有换来丫们对土共的支持。当老毛提出

要整一整风时，高知们连同各种民主人士趁机发动了对土共的疯狂进攻。当然，我们认为丫们主要的问题在于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而不只是“反党”。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那些主持反右斗争的党干中有相当一部分自己的屁股也是歪的，丫们自认代表党，代表社会主义。反对丫们，就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丫们反右，一来是打击同盟中的异己，转移斗争方向，二来是打击具有早饭精神的无产分子。什么下指标抓人，就是出自丫们之手。正是这同一帮人，在文革中更加娴熟地斗死老虎，转移方向，同时变本加厉地镇压早饭派。当丫们取得书写历史的权柄之后，自然是可以为同盟中人平反摘帽，就是在运动中，丫们也立刻认识到大家是自己人，要给以保护；但对于早饭无产分子，则唯恐污蔑之词太少，要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待遇提高了，条件改善了，日子舒心了。没多久，就赶上了土共搞整风。高知们表现的机会到鸟。）

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接着说：“提起来话就长了，远在重庆的时候，就酝酿过要拍《武训传》，但一直就没有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在解放以后终于拍出来了。”周恩来说：“是呀，对这片子，上海党也点了头的，所以大家都有责任哪！在片子送到北京来的时候，我看了以后，也拍了两下手。看时还有陆定一同志和胡乔木同志，他们也拍了手的呀。他们是理论家，这我一定要把他们拉上（大家笑）。所以说大家都有责任。”

（整风开始，夏衍趁机倒苦水：

我们当年拍《武训传》，那是酝酿（蓄谋）已久，精心筹划的，还不是为了繁荣（反）社会主义文艺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但党（具体谁们呢？）不领情啊，狠狠地把这个（反动）电影批了一顿。我们真是吃力不讨好啊。党内还是有很多人（具体谁们呢？）不懂（反动）文艺啊，土包子哪懂阳春白雪啊。

仲尼出来接着：是丫，我也觉得这个片子挺好的，看了以后直拍手啊。党内懂（反动）文艺的还是不少的，当年就有很多人拍手，比如陆定一同志和胡乔木同志，他们可是（反动）理论家咧。夏衍同志不要灰心，有这么多人支持你们的（反动）文艺工作呢。这不，繁荣（反动）文艺，大家都有份么？你们放手干，

有我们在，土包子们翻不了天。

仲尼表示大家都是一伙的，要团结一心。《武训传》是个神马玩意儿，大伙可以自个儿上网看看。当年对《武训传》的批判，也可以上网看看。这里就不表了。)

对一些人提出的“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党内有许多人对科学和文艺确实懂得不多。在全国的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百万是党员，他们对科学和文艺懂得一些。对科学是能领导又不能领导，但不是完全不能领导，而是在建设和政治上可以领导，对科学本身的问题，不学习则是不能领导的。”

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罗隆基提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

(整着整着，高知们、民主人士们，等等等等，就都跳出来了，露出了狰狞的本相。仲尼表示党内土包子们不懂科学和文艺，所以要学习，但现阶段还得懂科学和文艺的人来领导。政治上领导更是可以的，标准就是爱国。不爱国的高知们要批评，甚至要严厉地批评。但只是批评哦，动粗打人滴不行。罢官免职要征求意见。桶蘸线上的小伙伴罗隆基立马给了仲尼们一记耳光。还是罗隆基坦诚：我们大知识分子就是小资产阶级，我们就是有文化有技术；不是你仲尼口口声声说发展科学文化需要我们大知识分子吗？别替我们遮工人阶级这件破衣裳，我们不稀罕；你们泥腿子党里知识最多的也不过是些小知识分子，你们是外行，我们是内行，外行怎么能领导内行呢？仲尼是不是该高唱：啊，多么痛的领悟！那我们就是太小瞧仲尼了。为了桶蘸，为了国家的发展，仲尼表示得忍。他们只是一时认识有误，我们还是要通过和风细雨的说服教育工作来使他们靠拢。)

对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保护。例如，对著名作家萧乾，周恩来用请他参加座谈会的方式公开进行保护。

“总理讲话中间问：‘萧乾同志来了没有？’亚应声站起来。总理宽慰他说：

‘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后来又问：‘吴祖光同志来了没有？’并对他也热情地照样说了一遍。”

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受批判时，周恩来立即派夏衍前去探望，并嘱他让廖静文写一份“检讨”保护过关。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一九五六年在人大会上作的《新人口论》报告曾经引起争论，被一些人攻击为是宣传“反动的马尔萨斯思想”。当时，周恩来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马尔萨斯思想在分析人口的规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观性。”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受到不点名批判，有人主张把他定为右派。周恩来得到消息后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在周恩来直接干预下，马寅初得以幸免。

（这里只列几个典型，仲尼保护的高知不计其数。这帮子人到了文革又被拉出来鞭尸。丫们的屁股一直稳稳坐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又被仲尼们细心呵护着，能不招工人和学生们恨么？不过，丫们多数还是在仲尼们保护下侥幸地躲过了那场浩劫。于是，当丫们终于能自由说话时，自然是毫不留情地肆意污蔑那场险些让丫们挂逼的浩劫了。丫们虽然只能动动嘴皮，但掌握了权力的嘴皮也是能杀人的。丫们也是喝工人血工人吃肉的。丫们助纣为虐，对反革命大唱赞歌，对革命狂泼污水。一贯的表现充分证明，对丫们的专政是极为必要的，对丫们的仁慈是极为有害的。）

周恩来说：“过去右派利用教授治校向我们进攻，但批驳之后，不等于教授不管学校，不管教学。”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周恩来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仲尼们就是有才。一些人（谁呢？）不是反击教授治校，强调党的领导么？那我们就吸收高知入党，教授们入了党，再由他们治校，不就是党的领导了么？当一些人再强调要工人阶级领导时，仲尼就又把高知们划入工人阶级。党可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高知们都是先锋队了，还能不是工人阶级么？这些，可都是打着工人阶级、打着党、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的事。以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是朋友乃至同志的人，是不是太天真了呢？以为跟着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实现社会主义

的人，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时刻擦亮眼睛，盯紧丫们干的事，而不是只听丫们嘴上怎么说呢？听着只言片语搞斗争，焉有不败之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看到一份反映清华大学一个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后，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将这份材料印发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研机关的党委、总支、支部阅读并讨论，以“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

周恩来看到后，立刻在二十八日晚上召集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负责人陆定一、康生、张际春、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张凯、黄中、荣高棠、沙洪、邵荃麟、吴冷西、姚溱等到西花厅开会。他以鲜明的态度批评各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对教育部门，周恩来批评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反对学校中把一切工作成绩归给学生而不提教师的做法。对卫生部门，他指出要尊重和保护医务界的老专家。对文艺部门，他批评过分夸大文艺的政治作用，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是错误的。他要求与会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回去后“要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注意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

（定指标、拔白旗、放卫星，这些个难道不正是典型的刘邓做派么？你反右，我极左。你公社，我共产。你反自由，我割尾巴。你搞跃进，我放卫星。你搞四清，我拔基干。你 XX，我 XX。刘邓极左，仲尼反“左”。谁是“左”呢？不正是无产先锋们么？刘邓拉屎，仲尼搅屎。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老毛看出了这种形左实右的把戏，于是纠一纠。仲尼立马捕捉到战机，趁势纠“左”保右。）

第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又约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进一步分析“大跃进”中对知识分子产生这些“左”的偏向的原因。周恩来指出：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

（马不停蹄，巩固战果。扣上“左”的帽子，顺势就反了左。周瑜黄盖，萝卜白菜。）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又有新的发展。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形势下，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也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偏向，着手制定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各项具体措施，新的形势为周恩来采取新的措施来改善知识分子工作状况创造了条件。

（庐山会议，极右彭大刀力战极左刘修养，周仲尼、林妹妹们趁机搅屎，用老毛这个钟馗，打了老彭这个鬼。当然，一切都是阳谋。彭大刀是刘邓周林们的内敌，也是无产先锋们的大敌。所以在灭彭一战中，三拨人马都出了力。只不过，仲尼们灭了彭大刀，就立马把枪口对准了无先锋。抓住“大跃进”的把柄，屎盆子扣在无先锋头上。名曰纠“左”，实则纠左，打击无的力量，壮大资的力量。）

要顺利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七千人大会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纠正一九五七年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种种偏差。在团结知识分子，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方面，他在当时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其他人难以相比的。

（在仲尼们的大力保护下，知识分子们撑过了反右，越过了庐山，守得云开见月明。仲尼们抓住严重经济困难的机会，狠狠地反了一把左。仲尼们表示，经济困难的部分原因，就是没好好对待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才干。因此，今后的建设要大力依靠知识分子们。以往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对的，要反省，要检讨，要纠正。

世人皆下品，唯有仲尼高。仲尼对知识分子的大力保护和团结，赢得了知识分子日后对仲尼的热烈称颂：仲尼是完美的人，是不世出的圣人。老毛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小邓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唯有仲尼是完美的圣人。老毛心胸狭窄，容不下知识分子。仲尼心胸宽广，宅心仁厚，是知识分子的大恩人，大救星。仲尼施恩加惠，高知投桃报李。甚好，甚好。）

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有的人问聂荣臻：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哈哈，“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一个独立的物种。仲尼说：别跟我扯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这回事嘛，就是知识分子嘛。哦，不对，要说：淫民的知识分子。是咧，不要提神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多难听。要提淫民，淫民多好听。主席不是最喜欢提淫民么？神马为淫民服务，神马淫民民主专政。我仲尼这是传承主席的衣钵哦，左逼们不也最喜欢淫民么？要不怎么说仲尼才是左逼们的最爱呢？可这里谈论的明明是社会主义革命，明明是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必须鲜明地突出阶级性，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淫民是个神马鬼？分明是搅屎用的概念嘛。要么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来神马模糊不清的淫民知识分子？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哪来神马模糊不清的淫民民主专政？）

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起飞抵广州。他看望了会议代表，听取了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三月一日，周恩来约集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明确地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仲尼明确表示：不能再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啦。这不，要谈阶级？那我就来谈阶级嘛：我说知识分子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啦。仲尼的阶级意识相当敏锐啊，前脚还扯淫民知识分子，这会立马就提阶级啦。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阶级属性一定，接下来的就好办了。知识分子是光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同志们不要再提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啦。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同志们要对知识分子报以深切的信任，要热烈欢迎知识分子，委以重任。知识分子要成为革命的主体，而不是革命的对象。仲尼果真是高屋建瓴，一举奠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从此革命的火不能再烧到知识分子身上咯！

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这个调调，听着有些熟悉哦。曾经，改革的春风吹拂大地，万物复苏，有一种声音飘荡在空中：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要不怎么说邓挫是仲尼最忠实的小弟呢？正所谓兄弟亲，心连心。）

周恩来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充分肯定建国以来知识界取得的根本转变和进步。

（仲尼先生又举出了爱国的大旗。要说爱国，明明最不爱国的就是老毛嘛。老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却还要坚决地反对民国，一点都不爱国。倒是胡适之、蔡元培这些知识分子们确实很爱国，对付起赤匪来毫不手软。哦，对鸟，仲尼也是有一篇雄文的，叫《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被收入河蟹教科书，用来教育仲尼的接班人。至于那些前途无望，投奔延安的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那是既不革命，也没知识的。具体详情，诸位可以看本博所贴《心左扒革命知识分子的皮》一文。至于建国以来知识界取得神马转变和进步，很抱歉，好像真的很少哦。至于“根本”，那就更谈不上。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对宫廷斗争的热衷，对地主品德的讴歌，各种对小资精神的吹嘘，各种对风花雪月的赞美，各种对农民反抗的污蔑和歪曲，各种对无产阶级的蔑视和诋毁，各种对社会主义的无视和仇恨。当然，也有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空洞无物的所谓对封资修的批判，所谓对工农兵的歌颂。这批判，读来令人作呕；这歌颂，听来令人恶心。这就是仲尼先生所谓的根本转变和进步！）

报告中，周恩来批评了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仲尼先生真是语重心长，爱惜之情露于言表。是啊，要慢慢来，不能着急。是啊，要温柔，不能粗暴。是啊，要舒畅，不能憋屈。是啊，要促膝谈，不要上大课。总而言之，知识分子们怎么舒服就怎么来。知识分子们若是拒绝改造，那就……扯淡，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嘛。前面都已经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提法已经不存在，知识分子们都已经根本转变了，都已经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哪里还需要神马改造呢？）

他在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三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份报告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还是前面那一套，这回是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份量可不轻咧。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无产阶级的冠冕。从此，知识分子属于劳动淫民咯！）

可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党内认识上的不一致并没有真正消除。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和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毛泽东发表意见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老毛不识相，出来搅仲尼的局。老毛一语中的嘛，阳魂就是口头说法，阴魂就是阶级屁股。所谓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说的是有的口头喊社会主义，屁股还是小资。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就是说有的连口头都不喊。这哪里是神马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哪里是神马从总体上讲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毛和仲尼直接对立嘛，矛盾清楚明了。这时候要再不站出来，老毛可真就是脑子有泡了。但这已不是老毛说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嗯，这从来也不是老毛说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不管晚不晚，总还是要出手。）

一些人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没有阶级观点”；说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上当”。面对这种压力，周恩来没有沉默。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宣传文教工作的会议上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他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中都是这样提的，我是代表中央作报告的。”主持这次会议的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最后作结论时说：“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那是中央批准的。”

（老毛出来，“一些人”跟上。至于这些人是谁，写仲尼传记的专家木有说哦。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肯定是“极左分子”。“极左分子”疯狂进攻，仲尼压力山大，小伙伴陈毅也受到了攻击。然而仲尼没有沉默，仲尼选择反击。这不，仲尼立马搬出列宁的著作和修养的报告来作理论上的护身，又拉中央来作组织上的后盾。仲尼是在说：你看，我是有理论根据的，我是有组织基础的。“一些人”能超越列宁？“一些人”能敌过中央？这套拿革命导师和组织领导的权威来为自己张目，来吓唬人的把戏，我们难道不是见得很多么？此刻，忠实的小弟邓矮子更是挺身而出，维护大哥的场子。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小弟的站台，日后必收获大哥丰厚的回报。至于这“一些人”，自然要成为河蟹党史的反面教材咯。战斗当然并未就此结束。不仅如此，后续的斗争，还将更为激烈。但这一局，还是仲尼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五五年开始到六二年围绕知识分子问题的这一战，还是仲尼们占了上风，并取得了胜利。老毛一开始就没有把重心放到知识分子问题上，或者说，低估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性。这让仲尼们占了先机，并获得极大的搅屎空间。无产先锋组织了几次进攻，批《武训传》，批知识分子的屁股，反右。但每到触及这伙人的总后台时，进攻便遭到顽强的抵挡，并很快遭受反击。仲尼护佑高知，高知跳出来反党。老毛组织反右，刘邓施以极左，仲尼趁机出来反左。老毛组织跃进，刘邓大放卫星，仲尼趁机出来反左。老毛带人上山，刘邓抛出大刀，仲尼再趁机出来反左。这一切斗争，当然是紧紧围绕阶级利益展开的，其背后，无不是阶级力量在支撑。这一战，判断失误固然是一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无的力量不足，经验不够，至少投入到这一战当中的力量不够。因此，重中之重，还是要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壮大无的力量。

同时，我们看到，自始至终，知识分子们，尤其是高知，不仅经济地位远远高出工人，而且其阶级意识也完全是资意识，完全与无产阶级立场相对立的。这就导致丫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仲尼们的保护，而是主动出击，以现实的行为来生产并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并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当丫们受到无产阶级的斗争时，才把仲尼们召唤出来进行抵抗和反击。而仲尼们当然是乐于相助的，因为这是丫们群众基础的一部分。仲尼们清楚地意识到，维护丫们，就是维护自己的阶级力量。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庇护

者斗争的。与此同时，必须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更关键的是，无产阶级自己掌握足够的知识，从而彻底消灭知识分子这种社会存在。这就要求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教育领域的权力，坚定地推行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从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上全方位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人才。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在教育战线上，资无同样展开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第三章 反冒进集结号

前面谈知识分子问题的博文里指出老毛一开始对这个问题不是特别重视，至少无先锋们在这个问题上投入的战力很小、斗争不多、行动迟缓。从本篇博文将可以看出，五五年之后的几年老毛的主要心思在一化三改。经济领域的斗争更为激烈，也更为关键，所以老毛及其战友们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这个领域，也是情理之中。这时无先锋的力量本就非常有限，所以要有重点地进行使用。当然，这个时期老毛脑中仍然有经济主义的毒素，这影响了无先锋的斗争策略和方向，给仲尼们提供了很大的搅屎空间。本篇将叙述从五五年下半年到五六年六月期间，资无围绕反保守与反冒进展开的斗争。一开始老毛占得先机，抛出反右、反保守的政策。仲尼们虚晃一枪，避开锋芒，随后各种搅屎，再瞅准时机展开反攻，吹响反冒进集结号，一路高歌猛进，最后通过人大一锤定音。老毛几乎孤军作战，被仲尼们联合围剿，铩羽而归。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中国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大事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入高潮。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步伐都大大加快了。

（前面谈新税制问题的博文里提到，由于无先锋的斗争，仲尼们搞的新税制并没有获得正式会议的通过。由此引发出激烈的资无斗争，仲尼们施行了缓兵之计，躲过高饶们的攻击之后，迅速展开反击。一九五四年高岗自杀，无折损一名先锋。仲尼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在五五年把高岗拉出来鞭尸：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当然，和高岗同志积怨最深的要数刘修养，其次为邓矮子，但从之前新税制事件我们已可清楚看出，刘邓周实为一伙人，集体作战，配合默契。在对高岗的斗争中，仲尼也是出力甚多。建国后资无第一次正面交锋，无败，

损兵折将。新税制也鲜明地反映出刘邓周薄陈们的资屁股。因此五三年开始的经济建设当中保持着非常重的资本主义成分。但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铲除，加之革命胜利后工农巨大的生产热情，五三年开始的经济建设还是取得了较之前的历史快得多的发展速度。老毛大受鼓舞，决定趁势加快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也就是，加快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在涉及生产关系革命这一关键内容上，仲尼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搅屎，无先锋则针锋相对，进行反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阻挠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就是要维持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税制事件中我们就看出仲尼们试图维护资产阶级力量，并放手培养资本主义的外围力量，即各种小生产。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仲尼们又极力维护完全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知们的利益。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成为仲尼们有力的群众基础，进行着反社会主义的搅屎活动。）

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是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这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时间和步骤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作为右倾思想来批判，提出农村不久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这里说的右倾也是被屎学家们搞得一团浆糊。官方屎学说老毛小题大做，因为党史上右倾是个很严重的判词。若被判定右倾，那是要进行大批判，乃至肃反的。于是，按官方屎学的说法，老毛从这时开始就犯错误了，一直到文革，愈演愈烈。当然，官方屎学还只是说老毛对形势判断失误，犯了极左的错误。右逼们则完全是宫廷秘史的套路，庸俗不堪，不足为论。左逼们出来洗地，先和右逼们嘴炮，说毛一贯民主，不搞权力斗争。然后和官方屎学争论。比如有的左逼就说，老毛这里说的右倾只是说党内官僚主义重，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总之是对党内干部办事不力的批评，而不是什么立场问题，尤其不是路线问题。左逼说，老毛只是觉得干部办事不力，如果加以说服教育，改了这些毛病，就可以办好事，搞好经济。那么，左逼们说的对不对呢？关于权力斗争这回事，左逼们未免太清高了。搞阶级斗争怎么可能不涉及权力斗争呢？无产阶级不掌握权力，怎么实行专政？放手让资产阶级、让走资派掌权，那不是自找死路，自毁社会主义前途么？但是这权力之争，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阶级利益，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而不是右逼们说的神马风花雪月、酒池肉林。至于说毛的判断，我们说，右倾不只是官僚主义，但着重却在官僚主义，毛的这个判断不是太重了，而是太轻了。官方屎学和民左屎学们其实都把重点放在抽象的经济发展上，这时候的毛也有这个问题，仲尼们更不必说了。于是毛周们的分歧就被描述为只是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分歧，认为毛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只是因为官僚主义影响了经济发展，减缓了速度。毛当然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放在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内容来看的话，老毛指的速度显然不只是抽象的经济发展的速度，而是还有生产关系革命的进度。官僚主义拖累了生产关系革命的进度，因此被老毛指责。社会主义改造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对这项工作的阻挠和迟滞，被判为右倾（即严重的立场问题）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说老毛只关注抽象的经济发展速度，官逼说老毛冒进，左逼说老毛没冒，可是争来争去只是争个抽象速度，而没有去争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过左逼们有一点倒是没说错，刘邓陈薄们就是一般地搞经济也是漏洞百出，忽上忽下，很不给力。当然，左逼一如既往地不会扯到仲尼。仲尼是完美的嘛。）

十月初，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这个报告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掀起高潮。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自治区和人口满五十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会，讨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从个别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了。

（老毛的举动，与其说是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对之前党内官气的一种反击。不过，反击暂时取得了效果。农业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合作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但毕竟是往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一个环节。公私合营也不是社会主义，但也是从私有向共有过渡的一个环节。社会主义首先不是静态的一副画面，而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而在这过程中，要不断地和无产阶级的敌人作斗争，他们试图生产或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作为资本主义温床的小生产。这个改造过程不进则退，过程本身取决于阶级斗争，并且影响着阶级力量的变化。）

这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大量按语。他提出：农村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的改造发展了，工业的改造必须跟上，而且能够跟上，与此相应的科教文卫也要一并推进。）

“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列。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如左逼们所说，这里老毛所认为的右倾保守还只是一种工作态度问题，是努力不够的问题，是不够积极乐观的问题。而在我们看来，老毛的这一判断没有打中要害。后面将会看到，这给仲尼们提供了很大的搅屎空间。）

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增强了人们认为可以大大加快发展速度的乐观情绪。

（加快发展，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嘛，社会主义建设难道还要龟速前进不成。）

十二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他说：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

“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

“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

（我们事后来十五这个时限，冒不冒进呢？一点都不冒进嘛。尽管在仲尼们各种搅屎之下，到七十年代中也已经基本建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了嘛。丫们若是不搅屎，各种爬行主义，龟速前进的话，可以确定，成绩将会更辉煌嘛。更重要的是，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就要看，是哪个阶级的工业化，无产阶级的工业化，还是资产阶级的工业化；是为哪个阶级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或准资产阶级服务。工业化说到底也只是手段，阶级利益才是目的，是根本。资本主义都要搞工业化，社会主义当然更需要工业化。）

“现在搞工业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

（这是明确在批工业领域的干部了。而财经小组是统领各部的，哪个部出问题，自然都有丫们的责任。往下，财经小组又是仲尼下面直属滴。介个，仲尼表示，感觉到了老毛的攻势。）

周恩来当时也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他在那次座谈会上表示：最近政府在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

（老毛急攻，仲尼先避一下锋芒，承认保守。但留了两手：首先，保守只是“或多或少”，因此没有老毛说的那么严重，老毛这是在夸大其词。第二，反冒进是对的，主要方面没问题，只是带来了副作用，现在要消除这个副作用；老毛说要反反冒进，就是因噎废食。仲尼好一手棉里藏刀，以退为进。）

《农业四十条》提出的各项产量指标是过高的，在十二年内实际上难以完成。但它的公布，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立刻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大幅度修改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时原已确定的各项指标，并据以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当时，相当普遍的情绪是：“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

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一九六七年实现的目标，提早五年，改为一九六二年实现。

（按作者的意思，这下子又变成老毛一句顶万句了，圣旨一下，应者云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老毛说一千，到部长那里就两千，再到省委那里就五千，地委一万，县委两万……于是乎，归根到底还是老毛的错嘛，你不批右倾保守，大伙就不会这么干嘛。大伙还不都得听您的嘛。且不说丫们这种投机又推诿的做派如何坏事，就看当时的目标也并非高的离谱。再说，目标定高一点，努力往上靠，完不成也无妨嘛。拿冠军的努力，拿了亚军，又何妨呢？倒是怀着完不成的心态，那最终肯定是完不成的，因为过程中就不会去努力嘛。）

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的计算，不能不看到：如果按照各系统提出的这些高指标去做，那么，在一九五六年，国家统一分配的八类物资二百五十余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和严重不足的，最突出的是钢铁严重短缺，差额达七十多万吨，这将使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害。

（钢铁短缺，难道不正应该扩大钢铁的生产吗？将部分项目取消，转成钢铁生产可以吗？而且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提。那就是完全由中央（直接负责的当然是周陈薄们）统配物资，地方建设所需一切物资，都要报由中央拨发，用一块铁，一袋石灰，都要打报告，经中央批准才能使用。这实际上完全扼杀了地方利用各自条件进行建设的灵活性了，更别提利用中央直接掌控的那些物资。因此，建设不足，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物资不足，而是物资使用的灵活性不足。而且，苏联援助，而直属中央的那些大型项目的建设过程存在严重的浪费。周陈们不反思自己经济管理能力的问題，而首先指责指标。周陈是如何经过“周密的计算”呢？）

对正在加速进行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冷静地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他说：

“我国手工业有经营分散、散布面广、行业复杂、一般技术落后、社会经济性质不同等特点。”

（经营分散难道不正是要打破么？散布面广不正是该整合么？行业复杂不正需要纳入社会化生产的分工当中么？一般技术落后不正是需要改变的么？社会经济性质不同不正是要往社会主义方向改么？）

“应该注意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们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

“有些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工业，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干；如果在加入合作社后，一时难以调整，就让他们原封不动，待摸清情况后再行调整。”

（自己的产品，质量、销路，这不是典型的小资眼界么？如此一来，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反倒好得很了。要是没有傻帽的搅屎，集体生产的能比个人生产的差？何为不宜于集体生产的？有什么个人能生产集体反而不能生产的？保持分散，就是保持小生产嘛。何为不易组织合作？集体生产不正是要利用好的工艺么？让他们单干，保守工艺咪咪，到底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生产力的发展咧？仲尼真是好师傅的贴心人。至于手艺不好的，那活该饿死咯。那些有耕牛、有农具，总之有好东西的农民们，也是不愿和贫农们搞合作的咧。仲尼也表示，“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干”。难道单干风是凭空来的？话说回来，仲尼们也只是推手罢了，搞单干的动机还是在那些有“特殊好的手艺”和特殊好的生产资料的人自己身上。观众朋友们，我们得清楚，没有阶级基础，光仲尼们是干不成这些事滴。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切还得靠无产阶级自己。我们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工业，谁还稀罕那狗屁的手工艺？到时候那些“十分关心他们自己的产品质量”的人的产品质量根本不值一提，丫们的“市场销路”恐怕堪忧了。丫们得巴巴地来请求社会主义工厂的收留。我们有自己的大工业提供的先进农机、优良良种、水利工程、农药化肥，谁还稀罕那狗屁的耕牛铁犁？倒时候，丫们得巴巴地请求加入社会主义大农场了。所以说，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归根到底，还得靠无产阶级自己。在我们还在起步的时候，我们坚决不容许这些搞单干的来搅屎，来阻碍我们前进，我们要在和他们的斗争中壮大自己。）

“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因为这种经营方式对人民是方便的，也是受人民欢迎的，应该在长时间内将它保留下来。”

（淫民，谁是淫民？肩挑小贩互相竞争，做大了就成车拉大贩。小资们表示欢迎。无产分子恐怕要表示不妙。心胸狭窄的积极分子恐怕要问：你丫的钱从哪来？更粗鲁的恐怕要上去掀车打人了：妈的，现在是我们做主，你丫还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

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苗头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以更加郑重的态度叮嘱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名为强调好、省，实为以此打压多、快。实际上，恰恰是中央直管的项目搞得不那么好，不那么省，更别提多和快了。爬行主义展露无疑。）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

（这下咱对仲尼的语文水平都表示怀疑了。加快工业建设，不正是提早完成工业化么？合着加快工业建设，工业化反倒延后完成了？或者，放慢工业建设，工业化反倒提早完成了？咱表示理解的不能了。）

“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哪些领导者呢？能说说么？哦，恐怕只有老毛咯。其他的，都是从犯，或者干脆是被逼的嘛。）

突出的问题是各省市、部门要求基本建设投资数字不断追加，造成各方面的紧张。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二月六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等开会，

对他们说：“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二月十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可能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压缩。会议决定：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百分之六，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一百七十多亿元减到一百四十七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五百万部减到三百五十万部。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决议修订《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基建基建，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仲尼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为此，仲尼召唤出直属的哼哈二李，就干一件事：压缩投资。基建多了？砍！犁具多了？砍！缺公路的哭了，缺犁具的哭了。肩挑小贩表示不受影响，自有犁具的农民表示相当淡定。路少了，正好不用生产那么多带轮子的农机，免得有车没路跑。嗯，还可以省下一大批钢铁。铁路、钢架桥啥的少弄点，电站电网啥的少搞点，水利啥的少修点，这都能省不少物资咧。双轮双铧犁也要砍，钢铁不够啊老大。这一手生产平衡玩得真美妙啊。）

二月下旬，周恩来又两次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责成经委主任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张玺邀请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百分之四、百分之二点五。

（召唤完计委财政哼哈二李，接着召唤经委拨清波，这下老周直管的经济三大员悉数上阵。砍砍砍。不是用钢铁砍，是砍钢铁。）

到四月上旬，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相当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拜托，物资储备不用来生产，堆着烂掉废掉吗？这是搞社会主义工业，丫们还以为自个儿是地主老财呢？屯屯屯，屯得越多越好；我们的仓库满满滴。物资难道不是生产出来的？倒竟然是屯着，越屯越多？）

薄一波回忆当时的情景：“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

（“群众”竟然这么可怕，搞得经委一把手连如实说明情况的胆子都没有？这都是些啥群众啊！拨清波同志，你的委屈我懂，我来跟大伙说说让你害怕的“群众”是谁吧。比如，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浙江省委书记、老龟命江华，江苏省委书记、老军头江渭清，安徽省委书记、反革命曾希圣，等等。这些地方大员比拨清波资历还老，其他各省省委书记也都是和拨清波资历相差不多的老龟命，拨清波表示，这伙“群众”得罪不起啊。岂止拨清波得罪不起，二李也不表示吃不消，陈云也干不过。咱们的选票可都撰在这帮人手里呢。怕来怕去，说到底，还是怕丢了头上那顶乌纱帽嘛。总理说压，群众说加，拨清波们表示很被动啊，臣妾真的做不到啊。）

为了避免因再追加投资而带来更加严重的物资供需上的矛盾，减轻建设中已经出现的比例失调问题，四月十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这次会上，突出地提出了基本建设规模同我国实际所能供应的物资条件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

（还得是仲尼出手。）

周恩来在会上重申：“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

（竟然不是为了发展而奋斗，却是为平衡而奋斗！两条腿站着不动最平衡，那就干脆站着别动好了。不对，躺着最平衡咧。走路总要先迈一条腿吧？节奏跟上才是平衡，而不是神马静止的平衡！）

这次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的意见，决定从六个方面开源节流，来缓和供需之间的矛盾：一、增加生产。全国再增产钢材二十万吨、水泥三十万吨。二、厉行节约。双轮双铧犁的生产由三百五十万部再削减到二百五十万部，

以节省钢材七点二万吨，铁道部减少钢材用量五万吨。三、争取进口。四、减少出口。五、普查库存。六、互助调剂。十四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

（其它的暂且不提了，看第五项，“普查库存”；连库存都没有好好调查过，就能经过“周密”计算预知“物资储备紧张”，周陈是算命先生么？）

四月中旬以后，周恩来、陈云等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作出肯定的判断：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仍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的远景规划数字同样也冒了。

（周陈表示，压得不够，还是冒了，要继续压。）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二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更是竭力劝阻。

（老毛隐身了一段时间，终于忍不住了：你们丫，压压压，当我不存在呀！压个毛，要加！然而大伙表示不赞成，仲尼更是竭力劝阻。这可是当面“竭力劝阻”。温和的仲尼露出了凶险之相。）

胡乔木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左逼们不是把老毛吹成神吗？朽木一席话，难道不是狠狠扇了丫们一记耳

光么？仲尼们人多势众，老毛孤立无援，搞得很沮丧啊。不过，老毛被仲尼们孤立，也不是一次两次，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从这里可以看见，无先锋队力量相当弱，高岗首次冲锋就被干掉了，此时老毛孤军奋战。干不过丫们，只得悻悻离开，找机会再斗。至于仲尼说的理由，也是奇葩。“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啥叫紧张？紧张不是完全跟不上吧？紧一紧，还是能搞的，对吧？生产出来的，不又成为新的物资么？难不成物资消耗了就生产出空气？至于“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难道城市人口都是吃干饭的？工人不从事生产？想要防止工人力量壮大就明说嘛，扯这么多咸蛋，当咱看不出来么？哦，仲尼最后扯上了“良心”，小资们快来膜拜吧。老毛自然很生气：你丫良心值几个钱，你丫只对老板小资小生产讲良心，倒是对无产阶级讲讲良心啊。）

从五月起，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一步转到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上来。

（踢走老毛，确认力量对比，开始转守为攻。）

五月十一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六月一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这个报告。

（拉响集结号。发言就是喊话：下面的同志们要认清形势，赶紧站队。仲尼在主场对老毛做了缺席审判：反保守、右倾不能再搞了。哈哈，左逼们的毛神直接被周圣人无视了。）

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仲尼喊完话，修养立马跟上。大将小将齐上阵。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反冒进。压缩压缩再压缩，下马下马再下马。）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显然，周恩来的主要用意是要把反对冒进的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来，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并纠正这种倾向。

（反保守是假，反冒进才是真。仲尼继续喊话：同志们，我们兵强马壮，要扩大战场，扩大战果；冲出国务院，直奔全国人大！仲尼们反保守保守得很，反冒进倒是冒进得很咧。）

六月十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邓小平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六月四日中央会议作出的决定，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十二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草案）。

（修养继续发力，拉更多人入伙，提升会议规格至中央政治局会议；仲尼齐头并进，提升会议规格至国务院全体会议。看看这珠帘合璧，看看这绝代双雄。谁要再说仲尼不是修养一伙，而是老毛亲密战友，看老毛不从水晶棺里爬出来抽你。）

他在会上说：“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这些积极分子是谁呢？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嘛。仲尼说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丫认为无产阶级积极分子的要求不是群众的要求，因此对他们就是要泼冷水。仲尼的屁股，岂非昭然若揭？）

六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

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如愿搞到全国人大，战果杠杠滴。）

第二天，各报全文刊载这个报告，《人民日报》发表《读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社论。社论中说：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

（战场扩大到全国范围。发言就是喊话：全国的同志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冒进的决定，大家要看清形势，站好队。）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刘少奇要求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强调：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因为从去年开始“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

“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继续进攻，兵锋直指老毛。顺便也可看出，中宣部是个神马鬼，《人民日报》又是谁的喇叭。）

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

（赤裸裸挑衅老毛。）

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傻逼都看得出来是针对老毛的，既针对老毛个人，更针对老毛主张的路线。至此仲尼们完胜，老毛铩羽而归。）

对这个时期反对冒进的努力，薄一波在回顾时作了这样的评论：“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提前到来。”

（老龟命回想战绩，得意之色露于言表。老龟命倒是帮我们确认了：党中央是刘修养的党中央，国务院是周仲尼的国务院，反正没老毛神马事。老龟命顺势又把“大跃进”拉进来黑了一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老龟命们见不得光的咪咪。后面我们会讲。）

纵观这场斗争。一开始老毛占得先机，抛出反右、反保守的政策；是一招好棋。但没有及时拉人来巩固，或者说，没有发现身边可以直接用的先锋分子。仲尼们虚晃一枪，避开锋芒，以退为进。随后进行各种搅屎。再瞅准时机展开反攻，吹响反冒进集结号，一路高歌猛进，最后通过人大一锤定音。在这场斗争中，老毛几乎孤军作战，被仲尼们联合围剿，铩羽而归。中间冒出来的几个积极分子也是无名无姓，其攻势也被仲尼们化解于无形之中。无先锋的力量和资先锋们相比还是相当悬殊。这场斗争的背景也表明，小生产绝对不是无害的，丫们就是走资的群众基础。尤其在无力量尚未壮大的时候，小生产是在基础上阻挠无事业的大绊脚石。老毛只能伺机再动，尽力挖掘和培养无的力量。斗争还要继续。

第四章 反冒进大总攻

前文指出，仲尼们在五六年四月份对冒进反守为攻，吹响集结号，一路高歌猛进，到六月底在全国人大上通过丫们的保守政策，底定胜局。不过，斗争当然

不会停止。仲尼们紧接着着手制定二五计划，以及五七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两个计划当然完全浸透了仲尼们的右倾精神，根本上来说，即反社会主义精神。因此这是丫们继续巩固并扩大战果的举措。如此重要的计划，当然要通过最高级别的会议通过，这个会议，就是土共八大。八大，是走资派的誓师会；八大，是河蟹党的伊甸园。而仲尼的报告，则成为走资派的纲领，是河蟹党的圣经。矮子在二十多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八大正名，向仲尼致敬。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河蟹党真正的祖师，是仲尼。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组织上，仲尼都是河蟹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河蟹党的宗庙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仲尼计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表明党内资无力量对比的悬殊，老毛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隐忍妥协，等待时机。期间也有个别的无先锋出来喊话，然而并未能改变仲尼们的前进方向。下面，来看看仲尼们的表演。

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再次面对如何处理两个稿子中多次出现的“多、快、好、省”的问题。在最初的修改稿中，他仍然保留这个口号，而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这时，他把这个口号作为需要斟酌的问题，在书面意见中提了出来。因为一九五六年初以来，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只是“多”和“快”，而忽视“好”和“省”，并且常常以牺牲“好、省”为代价来求得“多、快”，这个口号没有发挥它预期的积极作用。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等经过再三斟酌，把两个稿子中原来多次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删掉了。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再提“多、快、好、省”。批评反冒进开始后，不提这一口号被指责成反冒进的“三大错误”之一而屡屡遭到批判。

（“多快好省”这个口号原来是被这样雪藏的。原来工人阶级都是浪费派，就仲尼们知道节约。这么明显的搅屎行为都不是错误，那才怪了。）

当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在书面意见中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在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并且强调基本教训是“均衡发展，综合平衡”问题，原来的报告稿对“困难谈得不够”，这是报告稿起草过程中所作的一次重要改动。

（要巩固前一段战斗的成果，同时为下一战赢得先机。）

周恩来还提出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的问题：“只要所有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都努力起来，发展工业，就可以在世界上得到平等的地位。”“如果有可能的话，东西方国家签订长期贸易合同是需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其实现。譬如说，中国并不拒绝同美国恢复关系，发展贸易。我们反而需要他们的东西。问题是，现在是在禁运当中。我们建设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我们有些需要的东西是美国所有的。”

（哈哈，古老文明，发展工业，平等地位。美帝也有古老文明哦。丫能跟你平等？丫就是要封锁你，丫就是要在你身边搞事咧，你能咋招？美帝不卖给你，你想的第一件事不是自己努力，自己生产；而是找各种路子跪舔，期望能搞到淫家的东西。不过严格说来，也算不上啥跪舔，资产阶级嘛，就是谈个生意，有多少钱，说多大话，办多少事。）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时再次认可了建议稿和报告稿，并说：“报告，我看写得不坏，就是头一部分文字上要重新修改修改，后面写得很好。”会议原则通过这两个文件。

根据毛泽东所提意见，周恩来等对报告中总结的四条经验教训进行润色修改，最后形成报告的第四稿。

（毛明显对第一部分有意见，仲尼只是进行了润色，哈哈。不过仲尼们人多势众，老毛也奈何不了他们。仲尼甩甩手：润色一下，算是给润之一点面子，别得寸进尺哦。）

九月十五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誓师大会正式开始。）

这次大会对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重要的判断：“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稿子准备就绪，一切尽在仲尼们掌握之中。哈哈，仲尼们一声令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啦。我们伟大的国度，不再有神马阶级矛盾啦，不用搞神马阶级斗争啦。以后的矛盾，都是淫民内部矛盾；以后的矛盾，是先进的要求同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后的矛盾……多么熟悉的调调啊，翻开设计师文选，瞅瞅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真是一样一样滴。八大，是走资派的誓师会；八大，是河蟹党的伊甸园。仲尼的报告，是走资派的纲领，是河蟹党的圣经。设计师在改开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八大是引路明灯，却被极左们遮蔽了二十年；土共走的弯路，是对八大的背叛。我们要回到八大指出的正确道路上，继续前进，开创辉煌。）

“有些地方却因而对其他农业经济——除棉花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桑业和各种农家副业的增产注意得不够，加上有些农业产品和土特产品受了收购价格偏低的影响，结果使农业经济不能够全面地和充分地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农民的收入。”

（农业生产要多样化，不要紧盯着粮食棉花。淫民群众的需求是多种多样滴。鼓励农民多样化生产，价格好商量。有好价格，才有积极性嘛。有积极性，才能使农业经济全面充分地发展嘛。有好价格，农民才能创收致富嘛。什么？几亿农民？那不可能都提高嘛，不可能同时都创收致富嘛。总要有个先后缓急嘛，先富可以带动后富嘛。哦，对了，农产价格上去以后，得要再给知识分子们涨工资，否则他们生活质量就要下降，就要影响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仲尼搞半天，不还是要分化农民么？分化农民，不正是阻碍农业合作化么？合作化都搞不成，还想往公社，往全民农业上走，可能吗？根本来说，不还是反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么？挡了这条路，无产阶级就要掉进几亿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走资将保持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提出“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说：“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哈哈，国家来统一市场，有计划地组织自由市场。这不就是左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么？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么？不管你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什么前缀，都改变不了其非社会主义性质。仲尼大可引老马原著说，市场不一定是资本主义嘛，小生产就可以搞贸易，搞市场，但这不是资本主义哦。可是，仲尼忘了，小生产就是资的温床。在无专政下的社会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反无产阶级的立场。一切不主动或被裹挟着往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转变的经济力量，都是无产阶级的敌对力量。阶级斗争瞬息万变，根本没有神马静止的东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就是往资本主义方向倒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采用选购的办法”。哈哈，仲尼先生倒是说说，不获得选购的生产者应该肿么办？获得选购的生产者又会有啥优待？让失败的生产者向优秀的生产者学习么？我来替仲尼先生回答吧：质优者获得选购，因为质优则有销路，符合自由市场的精神，是自由市场的原则。木有获得选购的咋办？凉拌呗。再接再厉，努力提高生产技术。神马？活不下去了？请看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自己体会。）

“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嗯，后备力量！木有后备力量，就木有安全感。木有安全感，就木法安心搞生产。木法安心搞生产，就木有后备力量。木有……好可怕的恶循环。后备力

量哪里来的呢？还不是出自生产？如何扩大后备力量？还不是要扩大生产？生产不扩大，要后备力量有个毛用？）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对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正在走向深化。

（确实在走向深化，深入资本主义化粪池中了。）

会后，周恩来和陈云等把工作重点，放到领导编制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预算上来。

编制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是由刚刚成立、主管年度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从一九五六年七月起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二百四十三亿元，比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又增加一百零三亿元。当经委把投资额压到一百五十亿元时，就受到各部门、各地区的强烈反对，不同意再往下压了。经委再次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平衡，发现即使压到一百四十亿到一百五十亿元仍显得偏高。

（为什么这些部委强烈反对呢？为神马？难道.....这些人都是傻子，经委的计算一定准确么？哈哈，还记得“税制改革”一文中指出的陈云们的低级错误么？为毛不再少算点呢？不如计算 50 个亿嘛，这样就更平衡了。保持平衡？这是最大的追求么？那干脆回到原始社会好了，原始社会最平衡。）

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着共同的认识：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不往下压，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支出必然会继一九五六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紧张程度在一九五六年已过多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一句话，必须把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坚决压下来，而且要压到明显低于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

（过大的基建导致积累率上升，导致过多动用储备。储备是为啥呢；一边说物资不足，一边说过多动用储备，边生产不就能边储备吗？在仲尼们看来，尼玛

中国跟发达国家一样，“积累率过高”，“规模过大”。可是，社会主义大国，不是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地发展么？）

但是，个别与会者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说：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冒进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结果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这个“个别与会者”又是无名无姓。作者还学会了保密呢，书中各种无名氏。之前就出现过“一些人”、“有些积极分子”，这里又搞出“个别与会者”。欲问他们是谁，作者就要赖：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不过这位与会者同志说出了真相：冒进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出现在执行。执行不给力，导致紧张，导致投资分散。因此这位同志强调在执行中可不应该松啊。终于出现一位说人话的。老毛，得赶紧把他拉到战斗队伍里来，好好用啊。谁们在执行啊？这分明是搅屎嘛。与会者也是点到为止，仲尼在此，丫也不可能直指罪魁祸首。看来，老毛确实是高估了情况。不过不是高估了啥物资财力，而是高估了仲尼们及其粉丝团的能力和态度。）

周恩来立刻说：“这四个字（指前一个发言者提到的‘冒、松、紧、分’）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与会者同志虽然点到为止，但还是戳中了仲尼的菊花。仲尼立马锁定敌人，进行敲打：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大实话，该打！主要问题就是冒，什么松紧分，这些都不是问题嘛。仲尼表示，要批右，但主要应该批左。哎？这个调调，灰常的耳熟哦。猜猜还有谁最爱说这话？仲尼向与会者同志喊话：我们主要应该批左，我看你这表现就左了，你要小心，别站错队了，否则后果很严重。你比高岗如何？想想高岗和我们作对，结果如何？）

“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建设方针影响了东欧国家。”“十几年来，他们就是这样搞

社会主义的，只搞重工业，不注意人民生活，完全学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发生的群众闹事，反映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

“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不重视轻工业导致闹事，好大一顶帽子。我们欢迎扣帽子，但帽子要扣对嘛，这顶帽子，就大大滴有问题嘛。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代表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吧？没有重工业的基础，轻工业如何大发展，如何搞社会化大生产？农业如何实现机械化，搞大规模生产？真的是不重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然后导致闹事？是这么简单吗？那么 49 年土共是因为啥胜利呢？49 年那么多饿肚子的，怎么没闹事，反倒勒紧腰带抗美援朝呢？倒是老板们，生产黑心棉之类的垃圾，喝前线志愿军战士们的血！老板们背后捅刀子干掉的志愿军战斗力，恐怕和联合国军正面干掉的有一拼了吧？这帮货色不拉出来活埋，却只是神马轻飘飘三反五反，就这仲尼们都不干，还要帮老板们说话，替老板们办事。神马国家发展还要靠这些老板，工人饭碗还要靠这些老板，这个在之前的“税制改革”一文中已经提了，本文就不多说了。按仲尼的理论，土共永远不可能干翻老蒋嘛。“人民生活”，哦，淫民又来了。听着浓浓的那啥味。赫秃子就要搞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看来仲尼和秃子不谋而合了。神马淫民生活。丫要真关心工农，就加紧没收老板们的厂子，改为国营厂，这不就有物资了么？丫要真关心工农，就让知识分子们少分点血肉，这不就省了物资了么？指东打西，就是怕压制了丫们的美好生活，美其名曰淫民生活。也对，仲尼们的淫民中有老板，有高知，有民主人士，有掌握好手艺的手工艺人，有走街串巷的肩挑小贩，有自带装备的单干农民；就是没有无产阶级哦。党领导下滴淫民民主专政。仲尼们，就想着一路新民主主义走到底，不要再往神马社会主义走了。来，让我们一起来歌唱：

新民主主义好，新民主主义好！新民主主义国家淫民地位高。

国民党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淫民大团结，掀起了新民主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周仲尼好，周仲尼好，周仲尼是淫民的好领导。

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淫民立功劳。

坚决跟着仲尼跑，要把那土豆牛肉一起来烧，一起来烧。

新民主主义好，新民主主义好，新民主主义江山淫民保。

淫民江山坐得牢，无产分子原地踏步就好了。

新民主主义万万年，淫民滴美好生活一定来到，已经来到。

“群众”又是个大框子，好市民没有土豆烧牛肉也是要出来闹滴，也叫群众闹事；农民觉得被征的粮多了，收入少了，出来闹，也叫群众闹事；工人受到混蛋领导操多了，出来闹，也叫群众闹事。总归是群众生活不够美好，于是出来闹事。那怎么解决呢？小资们不是嚷嚷要土豆烧牛肉么？增加待遇嘛，同时农产品要多样化嘛，农业生产要跟上，否则好市民们有了钱也吃不上好东西，又要闹啊。丫们要护肤保养、要衣着光鲜，咋办呢？轻工业跟上啊，经济作物生产跟上啊，否则丫们有了钱也买不上这些东西，又要闹啊。农民觉得吃了亏，收入少了，怨气深，咋办呢？允许有条件的单干啊，允许农民发家致富啊，繁荣农村市场啊，对农民少征多惠啊，多搞副业多创收啊，政府提价多采购啊。工人挨操多了出来闹，咋办呢？什么？这不可能。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都建立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肯定是极左分子闹事，瞎搞神马阶级斗争，或者是工人受了极左分子的煽动和误导，这是要往邪路上走，不行，要反左！)

“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各部“都应该退，有的应该退少，有的应该退多”，“目的是保持平衡”，使“明年不能再有赤字”。

（要慢一些，再慢一些；要退一步，再退一步。目的竟然是平衡？不能再有赤字？仲尼介个设计师都不能同意了吧？且不说丫们在之前就干过低级到把银行贷款当财政收入，最后核算弄出几十亿赤字的傻事。就算是有赤字，难道不是很正常吗？一定规模的赤字不正是扩大生产、快速发展所需吗？连老板的政府都知道，有点赤字恰恰是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这一点邓挫都知道。仲尼还是地主老财的思路啊。物资屯着，财政存着；物资紧张不好，财政赤字不好。我滴怪怪，这竟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思路！仲尼高唱：我要背上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

“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

（再次拿淫民说事，还拿老毛的话来搅屎，哈哈。淫民说，重工多搞无益，机器不能吃不能穿，还是土豆牛肉、绫罗绸缎实在。重工是手段，淫民是目的，现在淫民不满意，那就少搞点重工，多搞轻工多搞农吧。）

“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

（搅完重工搅国防。老毛说优先发展重工业，仲尼就说这要搞得淫民没饭吃。老毛说重视国防工业，仲尼就说这是要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哈哈，这招屎搅得水平有点差啊，快赶上共产风的昏招了。仲尼还有一个很奇葩的认识，丫不知道工业是个标准化系统，能生产坦克，改动一下就能生产拖拉机。军用改民用，有这么难么？）

刘少奇在报告中也就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应该注意这么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社会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

（群众，群众。哈哈，刘周好基友，老爱拿群众来威胁。）

“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

还是‘左’倾一点好？”

（陈老龟号召：同志们，爬行，爬行，龟速前进。）

“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这位“同志”和陈老龟一样，把左左右右搞得庸俗不堪。）

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等的讲话是不满意的，他在十一月十五日的讲话中谈了七点意见。他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

（泼冷水就是搅屎。明明是仲尼们积极性不足，一退再退，还各种促退。退完之后把屎盆子扣在老毛定的指标太高上。就这老毛要能满足才怪了。）

毛泽东显然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他当时没有提出批评，并且同意一九五七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一九五七年年年初批判“反冒进”时，他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七条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被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并在会后得到比较认真的贯彻执行。

（一路看下来，除了那个无名无姓的“与会者”同志出来顶了一下，黑压压一片全是老龟命及其粉丝。资无力量对比明显资占上风。老毛只能先退守，扔出一个妥协方案，筑一条堤，伺机再战。仲尼们的方针不仅被全会通过，还得到比较认真的贯彻执行，表明主动站队的自己人很多，被裹挟进来的观望者也不少。一九五六年，属于淫民，属于老龟命！）

纵观仲尼们这一路搅屎，真可谓风生水起，如火如荼，捷报频传。老毛在隐忍，在退守，在等待时机。发现战友要及时拉拢。在高岗同志的问题上，老毛就没有发挥好，没保护好自己人。不过高岗同志心理素质比仲尼们还是差了些。看看邓挫，三起三落，面不改色，死不悔改，坚不可摧。

老毛也要寻找战友，继续战斗。

第五章 党外反右

五五年初到五七年初这两年间，老毛是比较郁闷的，仲尼们是比较嗨皮的。老毛觉得社会关系改造、工业建设的进度都不如人意，干部们三风严重。在和仲尼们的斗争中也是一败再败，最后只能无奈地妥协退守。到了五七年，老毛觉得该下手整一整党风。老毛不发威，你还真把我当摆设了。不过整风要动员党外的人士，于是仲尼便又有了搅屎空间。仲尼是桶蘸高手，把党外人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快要捧上了天。于是这帮家伙误判了形势，以为可以跟土共轮流坐庄了，于是都跳了出来，铤而走险，向土共发起了激烈的进攻。土共自然要反击，于是仲尼们又开始小骂大帮忙，使尽手段来维护这些外围力量。仲尼肠子都悔青了，悔不该这么捧他们，这下摔得够惨。不过，丫们还是保护下相当一部分力量，丢了些小鱼小虾，大鱼大虾中只有章罗这样的死硬分子没保住，被撤了职。因此，本来要整党，结果这么一搞，变成了整党外的右派。所以本文将这段历史成为党外反右运动。不过这伙人本来也该整，外围力量也是力量，小鱼小虾也是肉，该灭就得灭。仲尼们也很清醒，于是也尽量出手相救。这一回合的资无斗争，无小胜，资折了些外围力量。

从一九五六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三月这半年时间内，各地发生的程度不同的罢工请愿事件有十几起，约一万多工人卷入，参加罢课、游行活动的学生也有一万多人。

（哎？肿么回事？九月的八大不是郑重宣告已经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了么？肿么会有那么多工人罢工事件？一万多人哦。社会主义接班人学生们也出来罢课

游行，也一万多人哦。介个跟八大宣告的盛世有点格格不入嘛。）

应该说，这个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处在一个相当好的时期，为什么内部会发生这些闹事的情况呢？

（是啊，为什么呢？）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是这样分析的：“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哟，一有问题，就把老毛抬出来解释。老毛也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虽然主要板子打在官僚主义上。但这时还认为只是官僚主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不是阶级矛盾的问题；认为搞一搞整风就可以，而不是需要一场群众运动，一场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误判导致了主要斗争对象的错位，也给了仲尼们极大的搅屎空间。更准确地说，也不是错位，而是延迟了对主要对象的斗争。）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全面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提倡新的整风来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大伙表示赞同老毛的观点：是时候整整风，活动活动筋骨了。）

周恩来说：“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出来。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我们承认矛盾，检查缺点，区别处理方法，就可以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来团结六万万的人建设社会主义”。

（仲尼接过老毛的话茬：大家搞清楚，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哦，现在是人民内部矛盾哦。领导和群众有矛盾，那是领导作风不好，要反思，要检查，这个矛盾还是可以解决的嘛。）

然而，当时在干部中却出现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以为“没有这个可能，可以高枕无忧”了；另一种倾向是，“把人民内部的一些争论，一些不同的意见，一些困难的问题，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一些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应该说清楚而没有说清楚的问题，人家有不同意见，就当成敌我的问题”。周恩来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前一种是右的错误，后一种是“左”的错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

（“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这是仲尼们内部的观点。另一种倾向则是认为不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而是有阶级矛盾，是阶级屁股的问题。按仲尼们一贯的思路，前者是右，后者是左。仲尼明确表示：右是错误，但不严重；左则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所以，要反右，但主要反左。左的倾向引起仲尼的注意，也表明，随着斗争的展开，无的力量在慢慢往上冒。）

周恩来说：“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因为你是先锋队，你是领导的党……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使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解决得好，保证生产力永远前进，上层建筑永远适应经济基础，领导者永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

（哎？怎么这么眼熟？党是先锋队，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仲尼真是有先见啊。江总的智囊也拾了仲尼先生的牙慧，整出啥三个代表。仲尼先生真不愧是河蟹党的祖宗。）

周恩来把这次整风同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进行了比较，说明两次整风的相同之处是，都从思想认识整起，联系到实际，理论同实际结合。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上一次整风主要是整历史上的风，拿历史作引子，拿历史的教训同当时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整风，而这一次整风的重点是当前的建设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像革命时期那样积累长时间的经验，究竟有多少错误还要很好地总结，不能一下子下断语。二是上一次整风可以允许很大一部分高级干部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这一次整风要在工作中整，就是要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整。

（延安整风那是大伙面临同一拨敌人，而因为错误所导致的血淋淋历史代价犹在眼前，所以整得比较成功。当然，延安整风那也不是像仲尼说的只是整思想认识，而是肃反了一大批人。仲尼估计对“很大一部分高级干部离开工作岗位”颇有意见咧。但所幸只是“暂时”的。仲尼在此暗示，此番整风也还是整思想。而且没有历史教训，只能在工作中整，也就是干部们连暂时离开工作岗位都不行咯。明明是阶级屁股的问题，却被轻描淡写为思想认识的问题。而且还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也就是说，即便不换思想也不能换人。这不许动，那不许碰，那还整个鸟啊？！）

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今天主要的一环还是发展生产，搞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思想上的风也就好多了，实际了，宗派主义也会少了，官僚气也会少了，”

（哈哈，仲尼就是这么理解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切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只要生产发展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难道不正是邓挫一天到晚叨叨的“唯物主义”吗？老马明明说的是阶级地位决定意识，明明说的是物质的阶级斗争决定物质基础的变化，从而导致意识的改变。到仲尼们这里，阶级斗争不见了，阶级地位不见了，生产关系不见了，只剩下个模糊不清的“生产”。仲尼们看来，粮食增产了，钢铁增产了，就离社会主义越近了，然后极大丰富，就到共产主义了。于是乎，社会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经历长期而激烈的阶级斗争，改造生产关系，确立无产阶级在各领域全面当家做主的地位，最终到达共产主义；而是勒紧裤腰带埋头苦干，干着干着，就到共产主义鸟。仲尼们的经济主义，贯穿始终。在无专政下，经济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坚持修正，就是走资。当修正势

力颠覆无专政，取得统治地位时，就成为资产阶级，而社会形态也就变成了资本主义。老毛这个时候也带有一些经济主义的成分，而没有彻底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这就让仲尼们的搅屎更顺风顺水了。)

周恩来在进行宣传和解释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注意改进实际工作，解决矛盾，调整关系，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他着重抓了调整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同文艺界的关系、同工商界的关系。

(哈哈，仲尼真是会抓啊。来来来，少数民族同胞们，来整一整我们大汉族主义的风；文艺界的朋友们，来整一整我们文盲老粗的风；工商界的伙伴们，来整一整我们盲目改造的风。立马把整风搞成桶蘸，哈哈。要不然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咧。这句话可不是我仲尼说的哦，是老毛说的哦。)

他说：“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认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

他还谈到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关系，指出：“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最后，周恩来谈了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强调“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因此必须重视民族化的问题，包括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培养民族干部等。

(民族，民族，就是不提阶级。各少数民族内部有没有阶级对立？阶级对立可以调和么？汉族工人和维族工人有没有差异，乃至，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可以调和么？汉族工人和藏族工人是不是同属工人阶级？何必强调民族差异？自然融合有何不好？这不正是阻碍各族工人相互交流，相互联合吗？汉族人多，这是

既定事实，影响汉族工人和其他各族工人联合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吗？难道不正是强调阶级，才有利于联合吗？民族自治，藏族工人玩自个儿的，不管维族工人如何，傣族工人玩自个儿的，不管汉族工人如何，这到底是有利于无专政，还是阻碍了无专政呢？工业化，现代化，谁的工业化，谁的现代化呢？现在藏族人民工业化了么？现代化了么？那么藏族苦逼繁荣了么？好像只有老板繁荣得很吧？胡乱邦大撤驻藏汉干，大派藏族干部，结果呢？不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么？这倒是河蟹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胡乱邦这一手，不正是跟仲尼一脉相承么？不过，藏族老板和汉族老板咋个斗，我们根本不关心。藏族老板咋跟河蟹撒娇，乃至真要自成一系，我们也不关心。关键是藏族工屁和汉族工屁内斗，乃至当了老板们的炮灰，这就比较蛋疼了。老板专政，工屁不觉悟，就死得快。归根到底，还是阶级矛盾嘛。）

（仲尼这段时间跟文艺界的桶蘸，在前面“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已有所论，此不赘述。）

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曾主张工商业等方面可以“搞一点私营的”。在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如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它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几天后，在讨论一九五六年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预算安排时，他又说：“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

（在仲尼先生看来，搞国营是死，搞私营是活。搞国营不自由，搞私营是自由。搞私营，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发展。仲尼倒是说说，搞私营咋个帮助社会主义发展咧？老毛说，三大改造要推进；仲尼说，三大改造要缓行。多留些自由，多存些活力。是啊，这不正是仲尼们走资的活力么？没有这些基础力量的支持，仲

尼们能走得这么嗨皮么？里应外合，内外勾结，上下其手，时刻挖社会主义墙角。三轮车、摊贩都给一部分自由，钉子一样杵在合作社之间。私人办的小学也继续办。老板继续嗨皮。而且，孩子学会认字就行，至于丫们学的是封是资还是修，那也不用管太多嘛。除了兵，都可以搞私营。哈哈，别啊。军队可以经商啊，自负盈亏嘛。或者搞点雇佣军也不是不可以嘛。来来来，都搞点私营。这叫百家争鸣，搞活社会主义！这跟邓挫有哪怕一点区别么？！仲尼的屁股，不是再一次昭然若揭么？）

（仲尼跟工商界搞桶蘸中，有个重要内容是安抚香港老板。香港问题，一直是由仲尼一手抓的。本博将专门写一文来论述仲尼在香港问题上的搅屎活动，这也是在《李超人的觉悟》一文中预告了的，大伙还得稍等些时日，哈哈。）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做的种种努力，创造了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开展党内整风的时机已经成熟。

（团结，和谐，哈哈，仲尼桶蘸搞得一团和气，大获全胜。嗯，时机成熟。仲尼问：少民同胞们，你们准备好了么？答：准备好了。仲尼问：文艺界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么？答：准备好了。仲尼问：工商界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么？答：准备好了。仲尼清了清嗓子：下面我宣布，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前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宣布了这个消息。

为了动员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中央统战部在五月初和五月中旬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以及地方的报纸每天都以很多篇幅报道整风情况。整风初期，运动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罗隆基提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农工民主党主要负责人章伯钧认为：“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哈哈，仲尼的桶蘸做得真是好啊。搞得民主人士们直接来要权啦：你们土共问题多多，一没文化，二不民主，土包子搞党天下，这是不行滴；来来来，我们也入伙，咱一起坐庄，或者轮流坐庄，岂不快哉？）

这些言论，周恩来认为是“出了轨”的。

（哈哈，仲尼认为只是“出了轨”。也是，仲尼想说，你们就在你们各自领域里搅好了。党内有我们在，你们还怕个鸟？咱们要并行而不悖，不要越了各自的轨嘛。同行在资本主义康庄大道上，要保持队形，不要乱。）

当听到有人要求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等言论后，毛泽东震怒了。

（老毛大怒：这帮屎一样的鸡巴玩意儿，给脸不要脸！丫们寸功未有，还一直搅屎，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下倒好，直接来夺权，真尼玛简直岂有此理，周可忍，毛不能再忍了！）

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反击是在六月六日“卢郁文事件”发生之后。卢郁文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是民主党派成员。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指出“一些人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认为“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该由两方面来拆”，并且批评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收到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六月六日，卢郁文在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

（哈哈，匿名恐吓，民主人士净出些下三滥的招。连自家兄弟都看不下去了。）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

（时机很好，发动反击。）

六月十二日，党内印发了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欲让其亡，先使其狂。右逼们义愤填膺地指责老毛是搞引蛇出洞，哈哈。毒蛇本就该打，就是要等出洞来，才能坚决消灭嘛。不过原本倒不是要引这帮蛇的，谁让仲尼桶蘸工作做得好，让丫们忘乎所以，自己跳出来呢？）

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五十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

（哈哈，诉个苦先：唉，我的真心，你们不懂。）

“有些朋友竟然看成漆黑一团，觉得波匈事件以后，中国也差不多了。”

（还是称之为朋友。哈哈，本来也是嘛。）

“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不仅是错误观点问题。已发展到人民内部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对立斗争，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当然反社会主义的还是极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面。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较我们的预料来得清楚。”

（哈哈，还是认识错误。本来也是嘛，咱们立场都是一样滴。但你们搞错了，

我们要有分工，党内的工作我来做，你们负责外围策应就好了，要认识清楚形势。)

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一般地仍把右派分子的问题放在人民内部的范围里讲的，但也谈了矛盾性质转化的可能性。

(哈哈，可能性。)

“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开着。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

(仲尼表示，改造的大门随时向朋友们开放。朋友们呐，反社会主义要偷偷地搞，旗子还是要挂的，你们要有点斗争水平，不要把反社会主义刻在脑门上，这不是傻逼猪队友的节奏嘛。至于反党，那就更没有必要了，党内大部分是我们自己人啊。你们可别犯糊涂。)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把民盟和农工民主党这两个民主党派错误地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派，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使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七月十八日，周恩来飞青岛，参加了会议。这次会后，反右派斗争就以狂风暴雨之势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发生了严重扩大化。

(又怪老毛咯。作者认为糟的很，我们觉得好的很。不，还不够。)

对当时的情况，夏衍后来回忆说：“那时谁不左？我也左，每几天要到中宣部汇报，每个人都拿个（右派的）单子去。”

(哈哈，这就是高知的嘴脸！立马从比谁都右转成比谁都左，高知认为所谓

左就是多拿些右派的单子邀功请赏，至少把自己摘出去再说。神马打击异己，神马出卖朋友，神马拉左充右，无所不用其极，高知们丑恶的内心暴露无遗。事后高知出来表无辜：是老毛要反右，我们没辙，只能这么干了。嗯，是啊，高知们总是无辜的。反正末了把屎盆子往老毛头上一扣就行了。左逼们跳出来洗地，说老毛如何如何无辜，是高知们自己开始撕逼。其实这种说辞完全是画蛇添足。老毛看到丫们互殴，要是没偷着乐，那他才真是同情心泛滥，还是趁早别干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份活了。不过对于这种人提供的所谓名单，咱还是要擦亮眼睛，仔细甄别，别误伤了自家人。)

周恩来对犯了错误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帮助。对章伯钧、罗隆基等错误严重的人，周恩来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七月七日，他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这样做“为的是救他”，“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面两方面都写了，能够救，欢迎他悔悟。社会主义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他承认了一部分，我们也欢迎，欢迎他改造，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他还说：“不能温情主义，要尖锐的批判，我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说话的方式，可以说理，大概我在朋友面前，总觉得我这一个人不是那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在朋友面前，说理的态度还是多一点。但是，立场不能不站稳。不然，他感觉大家都安慰他，你看，同情我的人很多，结果，他不会认识错误，关还是过不去。所以，严肃并不等于一定要搞得很凶，搞得粗暴；尖锐并不等于要打人，刺人。政治上、思想上刺疼他一下，并不是实际上要去打人。粗暴态度，动手打人，我们是反对的。”

(OMG，是不是有很多人没耐心念完这大坨文字？念完的有啥感觉？是不是像孙悟空听到唐僧的紧箍咒？有木有想一刀捅死丫的冲动？若没有，恭喜你，你已经修身成佛。仲尼表示，话可以说重一点，但打人滴不要，刺人滴不行。大家还是朋友嘛，批评是为了救人嘛。仲尼果然是圣人附体，佛陀转生，耶稣再世。之乎者也，阿弥陀佛，阿门！)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分别同章伯钧、罗隆基等谈话，就准备撤销他们所担任的部长职务征求意见，谈话中对他们有所批评，劝他们真心改造。

（表面积极，内心抵触。苦口婆心，慈悲为怀。无奈章罗很死硬，仲尼也是没有招。章罗好样的，咱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大右派，实在。）

当天，周恩来在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撤销他们的职务。

（没有保住人，仲尼很痛心。）

反右运动的浪潮也冲击到“总理办公室”，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三位秘书的亲属被划成右派。

（群众起来了，火烧到了自己身边）

这三位秘书没有为此受到牵连，照样做自己的工作。

（仲尼表示：你们亲属我管不了，你们我还是保得了滴。）

周恩来作了一些规定，他曾经召集意识形态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就划右派问题制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要划右派，需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对海外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需把材料送给他看。夏衍说：“总理是尽可能想保护一些人。”

（夏衍说了大实话。仲尼表示：关键位置的人要尽可能保，不能随便动。高知也不能动，对海外有影响呢。）

他十分同意邓小平在批示中加写的：“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该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虽然这一系列政策和指示在许多地方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对有些知识分子还是起到了保护作用。

（哈哈，小弟也表示：群众基础不能丢，外围力量不能弃。大哥深表赞同。“没有得到很好贯彻”表明无的力量开始上升。“起到了保护作用”表明资的力量还是很强，维持了相当部分的力量基础。）

回顾这一场围绕党外势力的斗争，由于这帮人中好些斗争经验比较差，跳得比较高，所以仲尼也没保住他们。但丫们还是保留下来相当一部分力量。可以说，这一回合的资无斗争，无小胜，资折了些外围力量。但是，更为关键，也更为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那就是老毛原先想要做的事：党内反右。

第六章 党内反右

前文提到，五七年初老毛想整一整党内保守的风气，但被党外右派的疯狂进攻给打断了，转而把精力放到对这帮家伙身上。在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之后，老毛回过头来准备整党内右风。这就是河蟹所谓的反右扩大化。其实所谓扩大化的反右才是老毛真正关心的重点所在。紧接着反右，就迎来了大跃进。大跃进，本来就是老毛的一个战略性提法，意思无非是说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所谓大跃进，是个总体性的说法。之前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比较快的推进，让老毛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但是五五年开始老毛明显地感觉到有一股阻力在阻挡着这个进程。因此老毛为代表的无先锋与这股阻力进行了两番较量，当然，根本上由于资无力量的差距，无没有取得成功，只得妥协退守。到五七年年中，开展的对党外右派的反击取得了成功，其中无的力量开始上升，这让老毛感到是时候对党内的右派发动攻击了。从九月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正式发动进攻，经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连续提升进攻强度，最后以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收官，正式确立战果。经此一役，无力量开始上升，老柯进入政治局。还未暴露的林妹妹趁机上位，成为常委。但是核心决策层依然资占上风，重要的执行部门依然被资全面掌控。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

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着重考虑到建设方面的问题，观点也更加明确起来。当时，两个新的情况对毛泽东的思考也产生影响：一个是，整风运动开始后，个别人利用党内关于“反冒进”的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

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等。这使毛泽东更加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因此，当反右运动高潮过去后，他回过头来准备解决党内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场争论。用他后来的话说是：“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另一个原因是，这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接着又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这使毛泽东十分兴奋。

（促进右派进攻的不只是反冒进，还有仲尼出色的桶蘸工作的作用。至于作者说“个别人”，那就有点太低估右派的势力了。至于赫秃子的话，老毛也是听其所需。这个时候，这位苏修头子的思路早就不是神马国际共运了，而是一和三少，土豆牛肉的共产主义了。老毛高兴，无非是觉得建设可以快速推进，毛子能快，中国为啥不能再快一点呢？）

“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

（朽木的这段回忆指出了老毛所认为的大跃进的性质：群众性的生产运动。也就是说，老毛觉得有必要，而且有能力把全国劳动人民调动起来，参加生产，从而更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看到苏修都这么有劲头，再回想土共的蔫儿样，老毛表示很不爽。）

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主要代表人的周恩来，自然地成为毛泽东批评的主要对象。在这以前，周恩来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

（哈哈，河蟹师爷明白指出，仲尼就是反冒进的主要代表人物，因此成为老毛批评的主要对象。而且斗争经验丰富、阶级意识敏锐的仲尼自己早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国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

（哈哈，仲尼也承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很高，要求增加生产。那么，是谁在不断给这些积极的劳动人民泼冷水呢？）

“一九五七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的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

（承认放慢的速度，但并不承认冒退。）

周恩来后来回想起这次讲话时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

（哈哈，读者朋友从讲话中读出了“抛弃反冒进”的意思么？）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在抓工资改革问题，由他向全会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他说：“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

（哈哈，对工农就是“合理的低工资制”，多低呢？只够吃饭，还只是尽量哦。这就是对工农生活的照顾。哎，请问，高知们过着咋样的生活呢？仲尼表示，高知们要涨工资，提待遇，不然过得不好，没有积极性，要危机中国的进步。但

是工农们只要有口饭吃就好啦。)

他还谈到，我国人口的增长应同生产发展相适应，指出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以及公费医疗严重浪费和低房租的不合理性，提倡用互助互济的办法!解决职工生活中的某些困难问题。

(谁在严重浪费公费医疗呢?工人么?可能么?为什么不明说出来呢?低房租不合理，房租交给谁呢?房东要嗨皮了。财政收入又要增加了。经济又添动力啦。哎?谁要交房租呢?一面说低工资合理，一面说低房租不合理，仲尼屁股到底坐在哪边呢?仲尼又提倡职工们要互助互济来解决生活困难，言下之意，工人们不要浪费公共医疗资源啦，房子也住差一点的就好，因为差的房子房租低嘛。)

然而，这些并不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

(老毛表示有更重要的事。)

十月九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发言。他以尖锐的语言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至于好省就附带扫掉了。”

(读者朋友还记得是哪位同志删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吧?嗯，老毛也是心知肚明，矛头直指这位同志。)

他批评一九五六年扫掉的另外两个东西，一个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没有点名地对“反冒进”问题提出批评。毛泽东为什么讲这番话，他究竟在批评谁，他的针对性其实是很清楚的，但当时与会的大多数大都不清楚，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会上没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多少意见。

(师爷这是在装傻呢?能参与这种级别的会议的人，哪个不是摸爬滚打多年，经验老到的?怎么可能不知道针对谁?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

因为意识到了，所以没说什么话嘛。大伙准备静观其变，看老毛接着出啥招。）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从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的事实中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经过这几轮斗争，尤其是反右，老毛已经意识到主要矛盾不是神马淫民内部矛盾，而就是资无之间的阶级矛盾，就是走资与走社的根本路线之争。师爷也指出来，反右斗争是一个转折点。）

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一旦在这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便会越走越远，导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师爷敏锐地意识到方向的转变，没错，对主要矛盾判断的转变，就意味着斗争方式的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呼之欲出。这对走资们来说，确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师爷的坦诚点赞。同时这也表明，文革的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深深地埋下，开始茁壮上升了。神马脑袋一热就搞起了文革，神马为了留下一个美好世界就妥协，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要么资专政无，要么无专政资，根本木有神马中华，神马淫民，神马共和国，左逼叨叨的这些玩意儿只存在于丫们的幻想当中。）

三中全会结束后，国务院及其各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进行体制改革、机构精简和工作改进，形成干部下放的高潮。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国务院成立了以安子文为首的安排下放人员十人小组。

（合着中央大员们原先都在北京窝着呢？还得老毛在上面压一下，大爷们才往下面跑一跑。哈哈，安子文为首。安子文是谁的人呢？大伙自个猜。）

十二月八日他离开北京，到华东地区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

（哈哈，拨清波还好意思回忆，就是丫们在北京搞得死气沉沉，老毛都闷坏了。还是到华东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带一点回京。）

十六日和十七日，他在杭州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有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渭清、叶飞、江华参加的会议，讨论浙江省委向省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无方干将柯庆施同志浮出水面。可惜老柯同志正值壮年，就一命呜呼了。有说是被独眼龙们搞死的。不管咋样，还是无方力量的一大损失。）

除前次会议参加的人员外，这次会议又增加了胡乔木、陈丕显、林铁、石西民、张春桥等。

（张春桥同志也浮出水面。春桥同志由老柯一路带着，上海的底子搞得相当好。以后我们会看到，这是文革中唯一一个无碾压资的城市。不过，此时二者都还没进入核心决策层。）

在杭州召开的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

（矛头直指头子仲尼，顺便也把干将拨清波一通骂。憋了太久的气，出了再说。那会儿子资力量明显占上风，老毛被丫们强迫签字，成了个摆设，哈哈。一句连半句都顶不了了。）

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

的罪魁祸首’。”

（哎？为神马老毛对着仲尼说啥子“个人崇拜”“崇拜偶像”咧？合着那会就有人批“个人崇拜”了？谁在批呢？于是偶像就成了罪魁？这个套路有点熟悉哦。尼玛群众觉得好，当然要崇拜嘛。你们只管你们自己的群众，把无的群众晾一边，倒怪我老毛咯？我可不管啥偶像不偶像的，无产阶级欢迎，对无产阶级有利，就行了。）

但是，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

（只是出了出气，问题没有说清，更没有神马实质结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会议在南宁如期召开。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

（加强斗争力度，提升批判调子，指出“反冒进”不是神马业务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资反冒进反掉了无的纲领，当然不是神马业务问题了。）

“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看看，还是仲尼明辨是非，顾全大局啊。老毛就是心胸狭窄，怎么能说灰心丧志呢？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还是同志嘛。老毛啊老毛，看来还得回一下共产党员修养的炉啊。）

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

米。”

（老毛没分清因果嘛。是谁们使党外的右派嚣张跋扈，以致错判了形势？只剩了五十米不过就是说辞罢了，既然已经指出是阶级矛盾为主了，那便要去找走资的阶级基础，以及走资的先锋力量嘛。难道前几年一边倒的斗争形势不是资产阶级力量占上风的表现么？如此明显的悬殊岂是党外右派的进攻所能比的？）

在十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杭州会议上老柯浮出水面，而在此时南宁会议上可说是脱颖而出。老毛直接拿老柯来批“总理”。是啊，一个市委书记，大大地压了大总理一头。大概老柯也是属于仲尼说的那不代表群众要求的少数“积极分子”吧。所以仲尼自然是写不出来老柯的文章了。老毛借机抛出反“反冒进”的主张，也是给老柯表态，为无站队。）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

（哈哈，被戳到痛处，难受肯定是的。至于坐卧不安，那就是夸大其词了，仲尼们都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理素质杠杠的，又岂会因为这点批评就坐卧不安呢？顾明又把仲尼们卖了：每天晚上都要聚到一起，私下串联。不过，当然不是神马商议怎么检讨，“等等”所省略的才是重要内容。也就是说，丫们是在商讨怎么应付，以及，怎么反击。）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一九五六

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是啊，回想五六年六月份，仲尼修养双龙戏了老毛这颗珠，玩得多么嗨皮。丫们只是打一下老毛的旗子，干的尽是反无的勾当。老毛明显意识到走资们是要把他当傀儡。是嘛，拨清波这样的都敢强迫他签字，可见丫后台之强，可见走资派势力之庞大。）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

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商讨的对策内容之一，是仲尼出来认错。老大就是老大，有担当，有气量，粉丝不多才奇怪了。不过，仲尼还是认为，大伙主观想法还是好的，是好心办了坏事，因此只是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神马路线问题。）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不过，同南宁会议时相比，会议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因为，一些搞经济的同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毛泽东认为：“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商讨的对策主要内容，就是表演“犯难”，就是要摆出罢工的姿态。表面上是退，实际上是攻，这是在逼老毛就范。老毛环顾四周，发现几乎全是仲尼们的人，“此外没有人”。这清楚地表明资的力量还是占了上风嘛。老毛的主动进攻打开了缺口，但无的力量补充不上，这是个大问题。人事大权仍掌握在资的手中，要是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无先锋恐怕很难上位。到了文革的时候老龟命们又使罢工这一招，这时候无先锋们可就不客气了：还他妈来这招，你们不干，正好，我们来干。哈哈，老龟命们以罢工相威胁，无先锋顺势接了手，这便是河蟹党屎说的早饭派夺权。于是有左逼出来洗地，说不是早饭派要夺权，是老龟命自己不

干了，早饭派木有夺权的意思。这地洗的，一听就蛋疼。夺就夺吧，丫们篡了无的权，本来就是要夺回来的嘛。无产不掌权，还搞个毛线的专政啊。）

关于“反冒进”的性质，毛泽东在十八日的会上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总路线，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

（缓和攻势，打一下圆场：总的路线是对的，个别看法不一致。）

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们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不郑重地考虑毛泽东不久后所说：“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

（哈哈，仲尼们就是顾全大局，就老毛固执己见。难道党不是事实上已经分裂了么？各自的屁股都稳稳坐在各自对立的阶级上，还能不分裂？貌合神离罢了。）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

成都会议是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三月九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的十八天会议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他也谈到，在建设速度上要留有余地，“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但是，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继续进攻，巩固战果。把反冒进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把冒进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啥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嘛。啥是非马克思

主义？就是非无产阶级嘛。非无产阶级就是反无产阶级嘛，就是反社会主义嘛。泼冷水的事不能干，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损。下面不要搞浮夸，不要搞虚报，上面自己心里有数，内部讲清楚就好了嘛。关键还是要促进。）

关于“反冒进”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哈哈，原来仲尼们就是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进行各种“周密的计算”，怪不得老毛要把他们“下放”到地方去搞调查呢。不过，仲尼说没听取多方面意见，那是不对滴。明明是有不少人要求增加生产的嘛。只是仲尼们给泼了冷水而已。仲尼们也并非没有接触群众。只是仲尼不认为“积极分子”算群众，不认为他们的要求代表了群众的要求。不过，说只看见死的物，而看不见生气勃勃的人，倒确实如此。把死的物说成实，而把活的人说成虚，真是高明的唯物辩证法咧。顺便一提，“少慢差费”乃是地方“积极分子”对中央直管的大型项目建设的批评。这说明仲尼还是接触到群众，接触到群众意见了的嘛。仲尼是每事皆问自己人，大略小节必躬亲。恋权不撒手，只为资掌舵。）

尽管毛泽东感到会上“思想谈得较少，似是缺点”，但是“这次会议解决了大批问题，比南宁进一步”。他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周恩来的检讨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哈哈，老毛可真是锱铢必较，不依不饶，仲尼们都这么检讨了，“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嗯，河蟹师爷认为，老毛这个家伙真无情。本来也是，老毛心理装的是路线问题，阶级斗争的事，到成都会议还得出来只是个方法问题，当然不满意，还要往前推进。）

成都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马上开始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做准备。毛泽东离开成都，经重庆，下三峡，到武昌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传达成都会议精神，统一思想。

（继续巩固战果，准备用权威会议加以确认。）

五月五日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幕，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正式会议确立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这也是对斗争结果的追认。由修养来作这个报告，哈哈。）

报告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强调“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从五月八日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天的大会发言，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

（积极分子开始冒头，保守分子带上伪装，中间分子被裹挟，随流而动。）

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做了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

（继续主动承担责任。）

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经过斗争，无先锋老柯进入核心决策层。林妹妹此时还没暴露，占据了更核心的位置。）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

（最重要的执行机构，全部由资把持，搅无的屎简直轻而易举。无力量对比资依然有着明显的差距。）

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造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的状况。党的干部中又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经过斗争，定下调子，争论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更激烈的搅屎和反搅屎了。）

纵观这一战，无占据主动，在自身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取得阶段性胜利。最后所谓“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当然只能表明此时无的力量有所增强。老毛的意见获得通过，也只能说是无力量加强，并主动参与斗争而得

到的结果。至于神马“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神马“集体领导受到损害”之类的，那就是无稽之谈了。有话就说嘛，有话不说，这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做法哦。不过，话说回来，核心决策层资依然占据压倒性优势。至于最重要的执行部门，那更是依然由资全面掌控。所以仅仅定个调是远远不够的，调只是指明斗争的方向，积聚力量去斗争才是关键。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

第七章 对战大跃进 1

正如前文说到的，河蟹左逼们把大跃进的说法搞得一团浆糊。按河蟹的说法，大跃进就是老毛头脑发热，盲目冒进。然后老毛一句顶一万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陷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当中，乱干一气。然后就各种资源浪费，然后更糟糕的是自然灾害，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右逼喜欢把五九年到六一年三年时间称为“大跃进”，因为这三年人口负增长，饿死不少人。左逼忙不迭跳出来洗地，说，大跃进没死这么多人呐，河蟹瞎说呐。再说啦，老毛已经退居二线啦，这些跟老毛没有关系啦；修养在一线啊，因此责任都在修养啊。后来老毛看不下去了，又复出了。右逼则说，老毛是恋权不放，想搞独裁万万年。

左逼斗右逼，被河蟹的夹子夹了小鸡鸡。神马一线二线，神马恋权独裁，左右逼一个样，都是阴毛屎观，狗熊屎观。阶级斗争都是阳谋，以力量为后盾，围绕阶级利益展开搏斗。这斗争必然包含权力斗争，因此跟啥阴毛狗熊之类的八竿子打不着。

前文也说了，大跃进就是指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各领域的生产关系革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这只是一个战略性提法。因此，大跃进必然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始终。但是走资力量从一开始就占据上风，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造成重重阻碍。因此，跃进本身需要对这些力量展开斗争，消除这种阻碍，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推进。也就是说，资无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因此，大跃进和反走资就是同一过程的一体两面。反走资有利于消除大跃进的阻力，大跃进有利于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是随着斗争的展开，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斗争激烈程度以及规模也不断变化。在文革的时候无力量上升，与资展开决战，斗争达到白热化。

我们对左逼右逼河蟹逼的嘴炮不感兴趣，我们只对资无之间具体的阶级斗争感兴趣，这是唯一对我们有意义的事。至于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炼了多少废铁，砍了多少树，我们根本不感兴趣。关键在于，怎么造成的？具体斗争过程如何？河蟹党屎虽然不免掐头去尾，也会在很多地方含糊其辞，制造混乱；但因此就指责党屎胡编乱造，而去找神马高级秘材料，去搜罗各种民间回忆录，那就属于因噎废食了。我们时刻强调，我们对于基本事实的认定与河蟹大同小异，含糊其辞的地方也可以找补，自己分析；问题在于我们的立场，我们对基本事实的评价，我们从基本的历史过程中要吸取神马经验教训，以指引我们在现实中的斗争，以及未来所不可避免的斗争。

仲尼传把五八年反“反冒进”计入大跃进范围，这倒是合乎实际的。党外反右是序曲，而到党内反右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伴随着跃进的展开了。所以，我们就按仲尼传对大跃进的时间划分，看看这段时间内资无双方的斗争情况。本文所要谈的，是五八年初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前资无之间的斗争。斗争主要在重工和农业两个战场展开，重工领域主要围绕钢铁生产，农业领域主要围绕人民公社。

伴随着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哈哈，不是对“反冒进”这个错误的批判，而是对正确的“反冒进”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于是掀起了一个带引号的大跃进的高潮。）

在“大跃进”中，广大群众为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所迸发出来的那股生产积极性，使许多干部，甚至高级干部都在想，只要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也许真的可以打破常规。

（哈哈，师爷倒是说说，啥叫常规呢？大概在师爷眼里，保持平衡，龟速前进，才是常规。师爷看来，步子迈得大要扯着蛋，疼。在师爷看来，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就要蛋疼咧。那么，仲尼们是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呢？）

“没有人民的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冲天的干劲，那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思

想出现。”“我们东方人受压迫有几百年了，现在我们翻身了，都要求迅速建设我们的国家，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

（生产积极性，共产主义热情，原来不过是民族主义啊。我们东方人，东方撅起！）

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道：当时“恩来同志在某市郊区亲自看了一块挂牌亩产十万斤的‘卫星田’，田亩上空，电灯通明，像灯光球场一样，这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把几十亩快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亩田里。恩来同志看了以后心情沉重，因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

（有外宾在，没有直接批评，哈哈，为了祖国的面子，仲尼可以放弃生产的里子。亩产十万斤，原来还有仲尼的功劳啊。仲尼就是这样调动生产积极性的？仅仅因为面子就姑息纵容，难怪王任重曾希圣吴芝圃们有恃无恐，大放卫星咧。嗯，科普一下，“大跃进”中第一颗亩产万斤的粮食卫星就是湖北省委书记王老龟放的。当然，王老龟因为第一个放，所以还比较低调，只是万斤。因为当时老毛压着省委书记们参加劳动，种试验田。王老龟的试验田在孝感，于是《湖北日报》就吹孝感地区某田亩产万斤。这些可不是神马高级秘，找当时报纸一看便知。当然，还是老毛的错，老毛听完只是说不可信，也没把王老龟咋招。但文革时候的早饭派可没这么温柔，丫们上来就把矛头直至王老龟；至于王老龟在文革里的表演，那更是精彩无比，咱们到时候再来欣赏。接下来的卫星只能越放越大，比如，同样在湖北，麻城试验田放出亩产三万五千斤的卫星，这次还是在《人民日报》上放。至于《人民日报》是不是敢惹这些地方大员，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了。连仲尼都没有出来喊话嘛。

比如这里，这块卫星田，在成都市郊，亩产十万斤，仲尼不也没说啥么？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哈哈，这老龟在文革中也被揪批，也有精彩表演。这老龟还对柯庆施同志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话说回来，这种卫星属于新闻，也就是说，属于小概率事件，在整体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普通群众对这种卫星毫无兴趣，丫们自己产多少粮食还不知道么？丫们放卫星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再说丫们也没用地方去放。只有老龟命们要追一把政绩，手里又有喇叭，那就闲着也是闲着，吹个牛皮玩玩，你在市报吹，我在省报吹，他在《人民日报》吹，反正也没

人管得了。再说，右逼们跟河蟹一样，说浮夸风导致高征购，于是把农民粮食淘干鸟，然后饿死鸟。这就属于脑残言论了。土共再傻，也不会等着粮食生产机构产出粮食，然后一个个统计，统计完毕再制定计划征购粮食，要真这样，以当时生产机构之繁多，交通之落后，通讯之不便，等统计完毕，估计城里人都成饿死鬼鸟。)

“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从一九五七年底、一九五八年初以来，各地农村大规模地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其中兴修水利是一项重要内容。

(哈哈，这个时期修建的水利有好多现在还用。用不了了了的河蟹也管不了了，农民们自个儿解决吧。)

北京是个缺水的城市……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也都是在“大跃进”时期完成的。十三陵水库是发动群众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建成的。那时，每天都有十万人参加劳动，运五万方土到大坝上。

六月十一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周恩来，毛泽东要求组织政府部长们去十三陵工地参加一周的劳动。周恩来立即进行部署。六月十五日，他亲自率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三百多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六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又抽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一整天劳动，第二天凌晨赶回北京。在党中央的带动下，原本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这就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难道不是大大超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常规么？老毛不赶着这帮办公宅男亲自去参加劳动，丫们能体会到啥叫群众的积极性么？这也来个五年计划，那也来个五年计划，不正是小脚女人走路的节奏么？迅速完成十三陵水库这样的工程，难道不正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典型么？按仲尼们的计划，红旗渠这样的工程根本就不会加以考虑，事实上也确实确实是劳动群众自己一锤一凿给建起来的。群众们要都这么守常规，红旗渠这样的工程估计永远都不会有了。还真是不知道，有多少群众

的力量，被仲尼们泼了冷水，挡在了生产建设之外。对了，几天前杜老龟死球了，不然倒是可以问问丫的，怎么让农民单干个十三陵出来。）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大跃进”中出现的愈来愈严重的高指标、浮夸风，使人们对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作出错误的估计，从而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推动农村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从三月成都会议以后，首先是小社并大社，四月份在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第一个拥有九千多户的大社——嵒嵒山卫星社。七月以后，逐渐出现并社和转公社的热潮，不少地方开始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这种局面，中共中央最初是“没有料到的”。后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称赞“人民公社”好。他认为农村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农民苦得不得了。

（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方向的推进，就是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哈哈，这种局面老毛都没有料到。本来也是，群众的积极性往往要超出在上者的预料。但是看到这种局面，老毛很高兴，迅速站在无的立场加以确认肯定。按资的路线走，就不知道是神马结果咯。）

另一方面，高指标和浮夸风又使中共中央对一九五八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产生盲目乐观的错觉，以为中国的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从而以农业逼工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

（首先，重心转移到工业并不代表不管农业了。其次，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推进，本身必须由工业的发展从生产力方面加以巩固和发展。而且生产关系的推进本身也有助于公社内部工农业的发展。因此这个时候更应该加速工业发展，来确保公社的健全发展。第三，工业的发展本身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是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大批成为农产品加工厂、各种轻工厂、乃至重工厂的产业工人。人民公社内部就可以搞一部分工厂嘛。再往全民性的企业推进。

师爷们总是把世界看成静止不动的。于是人民公社就被丫们看成是小农的劳动组合。哈哈，恰恰是盯着农业，不优先发展工业，才会永远停留在小农的劳动

组合层次。师爷们满脑子小农社会主义，却要把帽子扣到无头上。

看看改开开始时候无锡江阴的乡镇企业，不都是改开前人民公社的社办企业么？资产阶级上台，全面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合全国市场，于是社办的集体企业就变成鸟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鸟。这就是社会运动导致内部各分子关系产生变化，分子本身的性质也产生变化。左逼们幻想着以前的集体企业能够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里的孤岛，保持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这不同样是静态思维的产物么？不过说到底，也还是丫们的屁股决定的嘛。）

面对这两个新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这就是“大跃进”中引导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入误区的“北戴河会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从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讨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提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业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会议着重研究了当前的生产问题，特别是钢铁生产问题。

从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同时召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具体讨论了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业生产的领导和检查。

这次会议后，在全国很快掀起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战略目标没有大的问题，接下来是具体执行实施的问题了。）

钢铁生产的高指标形成巨大的压力，逼得各省开始“放卫星”。周恩来的心情是矛盾的。“大跃进”是一件谁也没有经验的事情。他不能不考虑：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办法建设工业，也许真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是啊，谁都没有经验。前面的各项水利工程不是群众运动进行生产建设的典范么？）

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指标的数字虽然完成了，但全年生产出来的合格的钢只有八百万吨，也就是翻一番计划指标的四分之三，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却达几百亿元，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说明群众的土法炼钢确实效果不好，不能达到使用标准。这是需要吸取的教训。此外，之前中央统配一切，统管一切的机制存在很大问题，加之仲尼们的资屁股也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一方面中央管得太多，直管的大项目建设又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地方建设却严重活力不足，因为可供支配的资源太少，调度麻烦，运行效率低下。因此地方官员怨气很多，老毛也指出了这个问题，批评中央统管扼杀了地方活力，要求下放部分权力。但是仲尼们不是下放部分权力，而是一放到底。比如，陈老龟就把鞍钢这样的中央直属的大厂下放给鞍山市来管理。这就属于瞎整。鞍钢不仅供应整个东北，还包括华北大部，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鞍山市所能接管的？这种一放到底的做法显然是甩包袱，把该管的厂子都给放掉，地方又管不了，于是就出现各种问题。此外，权力全面下放，也给地方盲目追加投资、上马项目大开方便之门，各路爱表演、求关注的官员拼命投、拼命上。这是造成建设混乱、资源浪费更为重要的原因。因为群众虽然参与广泛，但动用的资源毕竟有限，完全不能跟省市动用的资源相比。这种混乱本身就表明了无力量的不足。

前面已经指出，各执行部分全部掌握在资手中，如此一来，老毛虽然定好调子，但根本无法掌控具体执行。这就给资们提供了极大的搅屎空间。丫们执行混乱，完不成指标，反过来指责指标太高，而定指标是老毛的责任，所以大帽子扣到老毛头上，最后扣到群众性生产建设的方式上。老龟命们回忆起来，都说各地生产混乱，可是具体执行的不正是老龟命们么？丫们又说，因为老毛指标定得高，所以导致了丫们执行的混乱。哈哈，如此一来，老毛又是一句顶一万句了。横向来看，老柯主政的上海明显就比其它地方建设得好嘛。说到底，还是无的力量太弱。

此外，群众性运动在建设水利、制造水泥、修建公路等方面效果是很好的。在此期间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土法制造了大量水泥，并以此修建了大量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而且干同样的事，所花费的成本比中央直属的要低很多。比如，水利部的项目都是排大国，也就是排水为主的大规模国字号项目；而地方的项目

则是蓄小群，也就是蓄水为主的小规模群众性项目。后者用群众性运动进行建设效果就很好。比如，交通部建设的都是直专高，也就是中央直属专业队伍修建的高等级路面的公路，而地方的则是地方性群众性普及性的公路。同样，后者用群众性运动的方式进行建设效果极好。由此，当时地方就指出，中央搞项目，那就是正规化专业化高等级，但是少慢多费；地方搞项目，群众运动，鼓足干劲，于是多快好省。至于中央谁管事，哈哈，大伙自个儿想。）

由于周恩来努力接触实际，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当时“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周恩来对它的认识也是很有限的，更何况他又刚因“反冒进”而受过严厉的批评，所以正如薛暮桥说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发现问题“能挡的时候就出来挡一下”，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这个“能挡的时候”好像真的不多，比如有外宾在场的话就不能出来挡。）

当时，国内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民大炼钢铁”的蛮干，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几千万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炼钢铁，又严重妨碍当年的秋收，造成“丰产不丰收”；另一方面，不经试验、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刮起了“共产风”，大搞“产品调拨”、“平均主义”“吃饭不要钱”等，在生产关系上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哈哈，师爷很聪明，死死盯住大炼钢铁不放。至于具体谁在组织，谁在执行，师爷表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毛说要多炼钢铁，于是出现了大炼钢铁，各种蛮干，所以老毛有问题。至于农业领域，哈哈，邓子恢先森不见了，于是，还是老毛的错。不管咋说，老毛是老大，自然出神马问题他当然都要承担部分责任。替老毛洗地，认为他完全没有问题，那是左逼们干的事。我们只关心具体的斗争。）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先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着

重研究人民公社问题。这时，毛泽东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开始冷静下来。在会上，他指出：第一，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第二，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认为，废除商品和对农民实行调拨是对农民的剥夺。毛泽东还写信要求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委员认真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过渡本来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嘛。再从集体所有制往全民所有制推进，那势必需要相当发达的工业来支撑，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力量要取得明显的优势。这一点老毛一开始的认识不够清晰。认识总是随着具体运动的进展而发生变化，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以及是否紧跟运动。既然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那就有商品生产，但这个商品交换主要应该在集体和集体之间，以及集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而不是个人层面的交换。换言之，小生产依然要严格加以限制。所以，修养们所搞的单干当然要禁止。集体所有制的线，必须要守。而且集体所有制企业也要盯紧，时机成熟，就要往全民所有制转。如此才是不断往前的革命方向，也是无专政下阶级斗争所应坚持的方向。）

随后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纠正“共产风”，同时，讨论了高指标等问题，提出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发出警告：“胡琴不要拉得太紧，唱戏拉胡琴，转那个东西转得太紧，它就有断弦之危险。”

（嗯？谁在搞共产风？邓子恢先生表示没有听到，修养和矮子也表示没有听到。师爷不提，我们就来提几句吧。有人说是修养和矮子主动指示下面搞共产风。我们姑且不搞得这么诛心。可以肯定的是，下面有人像丫们报告这种现象的时候，丫们没有表示反对，也就是说，丫们默许了。哦，对，肯定还是老毛的错。老毛的批评威力很大，丫们不敢批评反对，怕被扣反冒进的帽子。好吧，老毛你还是认了吧。既然是你犯的错，既然你一句顶一万句，还是你自己出来擦屁股吧。老毛表示遵命。于是出来纠正共产风，同时压缩空气。）

从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研究人民公社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形成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

本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最终确定的结果，灵活性大大增加，但是守住了集体所有制的底。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都是社会主义下的资法权。只要是集体所有制，而非全民所有制，当然会有这些资法权。但这只是阶段性的结果。问题在于是依据其发展，不断促进其往全民所有制方向改进，还是固守不前，甚至倒退回去搞单干。促进还是促退，就是无和资的分野。可见在人民公社这个战场，不管是上层不同阶级立场的领导之间，还是下层不同屁股的群众之间，斗争都异常激烈。资无在这个战场的成败，当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时是双方形成僵局，难分胜负。而且之后还要进行长时间的争夺战。）

在三十日的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两条腿走路”，而不要像苏联那样，偏于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

（资搅屎成功，老毛妥协。且不论资搅屎造成的影响，五八年钢铁生产不足本身就表明重工还是太弱，必须要优先发展，重点发展。否则如何去支撑轻工和农业的发展呢？）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并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这就是左逼们叨叨的一线二线说。老毛当然不可能真的退居神马二线。在一线的时候他主要也是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决策如何，都是和资斗争的结果。到了所谓二线依然如此。根本还是在于资无力量的对比，在于资无之间具体的斗争嘛。）

中共中央决定在六月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落实计划。为了开好这

次会议，必须对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建议，国务院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在五月二十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

（哈哈，56年开始激烈争吵，到了59年资把控的行政部门也没有摸底。这尼玛不是赤裸裸的搅屎吗？轻点说，叫官僚主义不作为。重点说就是资对无的专政。国务院分明是资的大本营嘛。）

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约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十二个副总理进行座谈，对国务院的工作做了全面安排。关于副总理的分工是：陈毅管对外工作，罗瑞卿管政法工作，彭德怀管国防工作，聂荣臻管科技工作，李富春、薄一波管工业交通工作，李先念管财政贸易工作，谭震林、邓子恢管农林、水利工作，乌兰夫管民族事务工作，贺龙管体育运动工作，习仲勋管国务院常务和领导直属机构，林彪、邓小平不分管国务院的经常工作。为了便于各主管副总理分工管理各部委和处理日常工作，在国务院下面成立六个办公室：政法办公室，罗瑞卿任主任，分管内务、公安两部；文教办公室，张际春为主任，分管文化部、对外文委、教育部、卫生部、体委；外交办公室，陈毅为主任，分管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对外文委（对外政策）、外贸部（对外政策）；工业交通办公室，李富春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分管冶金部、化工部、一机部、二机部、煤炭部、石油部、地矿部、建筑部、纺织部、轻工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水电部；财贸办公室，李先念为主任，分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外贸部、水产部、劳动部；农林水办公室，邓子恢为主任，分管农业部、农垦部、林业部；国防部由彭德怀直接领导；建委、计委、经委、科委等四个综合性的委员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聂荣臻等四个副总理分别直接领导；民委由习仲勋管理。……为了沟通情况与交换意见和经验！还决定每两周举行常务会议座谈一次。

（OMG，清一色资派，国务院妥妥是资大本营。）

谈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时，周恩来指出：应该给农民“一点小自由，让他发挥点个人的积极性，不会妨碍大集体的。这是大公小私，两条腿走路嘛。有

个人嘛，没有个人哪有集体呢？三人才为众嘛！‘共产风’来了，就把这些忘了。大集体小自由早讲了，就是没有好好执行。”

（给农民点小自由嘛，多轻松啊；给资产阶级点余地嘛，多够朋友。大公小私两条腿，这是神马奇葩的理论？还能再庸俗一点吗？时刻不忘搅屎，一点点挖墙脚。）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邯郸地、市委负责人等谈话时，除了工业问题外，还谈到农业问题。他说，少搞点工业还不要紧，农业搞坏了就不安定，对农业必须重视。工业交通方面，指标不当的要压一下。工业也不只是钢铁，有帅就需有兵。四大指标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完成。生产和基建之间，要先压基建。邯郸是个好地方，有工业发展前途，但不要走得太快，快了农业会跟不上。

（前面在农业领域，用个人压集体，用小生产瓦解集体生产，挡住前进方向。搅完农业领域的屎，又拿发展农业的名义打压工业，搅工业的屎。我们可以看到，仲尼至始至终都在搞这一套。）

在这种严峻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决定七月初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同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将各种指标落到实处，更好地实现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

（资搅屎取得成功，准备开个大会来解决，这就是本来要开的庐山会议。但半路杀出个彭大刀，于是乎，斗争又发生了变化。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后文再谈。）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可以看出，无占据先机，推出重工方面的跃进计划以及农业领域的人民公社化。资掌控各执行部门，进行各种搅屎。钢铁生产推进缓慢，土法炼钢效果又差，于是资以此为由，逼迫老毛妥协，压缩各项指标。在农业领域人民公社化快速展开，无方一开始也未认清公社的集体性质，被仲尼们抓住把柄，进行搅屎。但无及时调整认识，并坚持斗争，还是暂时守住了集体所有制的底线。当然，仲尼们也时刻不忘推动小生产，鼓励小自由，以此来瓦解集体生产，阻碍农业进一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在重工、轻工和农业三者关系上，

仲尼又时刻不忘以发展农业为名压制重工发展。因此，仲尼的搅屎是全方位的。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斗争，资无各有胜负。资成功压制了重工的进度，无成功守住了集体的底线。这番斗争表明，日后一段时间的斗争重点依然会在这两个领域，以及农工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第八章 对战大跃进 2

前文说到，资无围绕重工和农业领域的人民公社问题展开斗争，到庐山会议前，资无各有胜负。资成功压制了重工进度，无暂时守住了集体农业的底。本文将叙述庐山会议上双方的厮杀。一开始资顺着之前的路子继续推进在两个领域的搅屎活动。然后半路杀出个投机资分子彭大刀。由于大刀历史不干净，屎点比较多比较明显，所以老毛逮住机会，准备断掉资阵营的大刀。仲尼们见保彭无望，便弃了彭大刀，保护其余人。斗争结果，彭大刀等一干军头下岗。老毛也由此得出阶级矛盾为主的结论，阶级斗争为纲的方略呼之欲出。但仲尼们还是成功压制了重工和公社的进程。

六月十三日，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等问题。发言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指出，“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抓得不够。毛泽东强调今年余下的几个月时间要搞平衡。周恩来认为，工业布局上的毛病是生产资料上的指标定高了。现在要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把生活资料的比重提高一些，比较有利。他说：现在要公开讲增产节约、具体办法是多抓商品性生产、抓食品定量、压缩购买力、减人。

（老毛被搅屎，认识发生了偏差。之前已经得出社会主要矛盾是资无之间的阶级矛盾了，那么社会运动的核心必然也是资无之间的阶级斗争。既是阶级斗争，必然有基础的阶级力量，以及各自的先锋力量。那么，资先锋力量在哪呢？资的阶级基础又是什么呢？无的先锋力量在哪呢？无的阶级基础又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应该首先思考的问题么？没有先锋力量，没有阶级基础，那还搞个毛阶级斗争，搞个毛无产阶级专政啊？但前面被仲尼们在重工、农业、重工和轻农之间

关系三个方面成功搅屎之后，老毛也认为主要问题是综合平衡了。

老毛说五八下半年时间要搞平衡。仲尼顺势指出现在不平衡，工业上是生产资料指标定稿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不够，要提高比重。这不就是以轻抑重么？

哈哈，还要“多抓商品性生产”，这不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么？但仲尼留了很多口子，因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交换，集体和集体之间的交换，集体和全民之间的交换，这四种关系都是商品关系嘛。无的思路应该是适当发展集体和全民之间的交换，并注意促使集体往全民的方向发展；限制集体和集体之间的交换，以避免市场竞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快速生长；杜绝小商品生产，避免小生产之间的竞争导致贫富分化，产生对立的阶级关系，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以及小生产从内外部对集体形成的瓦解作用。

还要“压缩购买力”，压缩谁的购买力呢？哦，反正不是知识分子们，非但不能压，还得提，不然就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危及社会主义建设。嗯，也不能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小农，因为要允许他们单干并提高商品收购价格，才能增加他们的收入，不然就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危及农业的发展。那，只能是工人了。这工人，既包括工厂的，也包括公社挣工分的。总之是拿普通工资的劳动者。仲尼已经说了嘛，要合理低工资，这是直接的压缩。仲尼又说了，要合理高房租，这是间接的压缩。还要少用公费医疗，也就是多用自费医疗咯。嗯，这购买力压缩得杠杆的。

最后，还要“减人”。减什么人呢？看看仲尼一贯的做法，大伙不难猜到吧？）

七月二日下午，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确定了毛泽东为庐山会议出的十九个题目：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任务；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社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十九、国际问题。最后一个题目是周恩来提议增加的。

（从一开始确定的会议内容来看，是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但主要还是偏向了仲尼们的线路。）

会议从七月三日开始，最初是按六个大区分组讨论，主要议论的是形势和任务。大家“摆情况，谈看法，提意见”。不少人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的人认为是“得不偿失”。话虽尖锐，气氛却很好。

（“不少人”、“有的人”很尖锐，但气氛很好。是啊，资派畅所欲言，说出心中不满，使劲地出气，气氛想不好都难嘛。）

每天上午九时，下午三时开始学习讨论，晚上听戏、跳舞或看电影。正如薄一波后来回忆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会上畅所欲言，会后听戏跳舞，可不就是丫们的神仙会么？）

关于一九六〇年的任务，周恩来认为应该是“在调整比例关系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在保证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工业速度可放慢一点，今后三年农业放在第一位，工业为农业服务。

（老套路了：农业第一，工业放慢。不过，即便是发展农业，仲尼的思路也不是神马社会主义农业，而是“个人自由多一点”、“商品生产多一点”、“允许单干”的农业。于是仲尼们的搅屎思路就很清晰了：阉割重工业，同时工业为挖社会主义农业墙角服务。）

这一时期的会议，整个来说，纠“左”的呼声比较强烈，但是对形势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华东组的讨论中，就有人提出：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哈哈，毕竟还是华东组有无的力量。形势向资一边倒之际，无先锋还是站出来喊话。是啊，想着指标越低越落实，就是保守嘛，就是以落实来掩盖保守思想嘛。干脆零指标好了，啥事都不做就实现了。）

毛泽东认为：“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

的是什么？”“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

（老毛温和反击。是啊，缺乏全面分析的同志是谁呢？仲尼们不是嚷嚷最凶的么？指责大跃进整体得不偿失的不就是他们么？可是，不断下各种绊子，各种瞎指挥乱作为的不也是丫们的人么？当然，无产群众的很多生产活动也是有诸多不足的，但老毛也说，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无产群众的进步都是用教训换来的嘛。这说明无产群众更需要积极参与各种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如此才能积累斗争的经验，不断提升战斗力。）

毛泽东最后总结时，将形势概括为十八个字：“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

（哈哈，毛对资势力还是估计不足咧。）

为什么一九五八年已经出现财政赤字却没有被看出来？那一年的财政情况是：在银行的账面上，收入和支出都是一百九十亿元，看起来收支平衡。但在收入的一百九十亿里，把国家节余的三十五亿算为收入支付出去了，再有，多发行货币十五亿，加起来是五十亿。

（哈哈，这就是财经领导们的会计水平。）

到了一九五九年一至六月，财政情况中的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了，收入二百六十亿，其中节余四十七亿存入银行，在银行的收入账上不是动用了四十七亿而是五十一亿，有四亿没有算清。另外，又多发行了六亿票子，违反了通常的规律。在银行的收入账上是一百一十四亿，非正常投入占五十七亿，这个数目相当大，其中，工业用款六十二亿中，不正常的有三十一亿。

（谁在不正常地使用资金呢？）

究竟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提出几条办法：算账。

（哈哈，财经领导们的算账能力堪忧啊。）

第二，收权。去年权力下放，但有一定的限度，不能什么都下放，要收到中央和省市两级。

（哈哈，这是在打自己的脸啊。至少也是在打陈老龟这个自己人的脸啊。陈老龟一声令下：一放到底。哈哈，据说老陈还不断打电话督促，一定要放到底。结果就尼玛出现把个鞍钢下放给鞍山市管的荒谬案例。一会儿中央统管，一会儿一放到底，真是忽左忽右，令人头晕目眩咧。这尼玛要想不少慢差费都难啊。）

第三，归口。哪一件事都要按口子办事，银行贷款要有一定的条文，有一定的规定。

（银行表示老龟命们难伺候啊，淫家伸手要钱，俺们不敢不给啊。）

第四，堵口。要求基建限额以下的停下来审查。

（哈哈，合着上马的时候未经审查。）

第五，导流。对停办项目要给人员找出路，或转业，或回家。

（哈哈，别干了，回家种田，农业第一嘛。）

第六，增产。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要增产商品、活跃市场、回笼货币。

（哈哈，原来增产商品、活跃市场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啊。是啊，商品增产了，市场活跃了，货币各种自由流动啊。等等，这不是需要更多的货币了么？怎么回笼货币啊。）

从财政方面出现的问题，周恩来立刻联想到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的问题。

（联想丰富。财政问题真如仲尼所说么？首先，投资的浪费明明主要是资各级部门的失职所致，因此解决投资浪费首先要整治资各部门而不是简单切断投资嘛。其次，正常情况下有点赤字是极为正常的嘛，仲尼们却把赤字当成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分明就是地主老财的发展路子嘛。）

按照毛泽东七月十日讲话的安排，庐山会议原来准备在七月十五日结束。十四日，会议已经印发了胡乔木等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但是，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一封信，陡然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资本来已搅屎成功，取得胜利，老毛被迫妥协。就在丫们准备鸣金收兵之际，杀出来个彭大刀，哈哈。）

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这样写道：他写这封信是因为感到一些问题不便在小组会上讲。他说：“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

（开会不就是要讲这些内容么？还真以为是神仙会啊？“某些干部”是哪些呢？彭大刀咋不说咧？）

他还对人说，只有他来写这封信最合适，因为“中央常委之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之后更不便说话，恩来、陈云同志犯过错误不能说话，朱德同志意见较少，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了解情况不多，不甚说话，小平同志亦不便多说”。

（哈哈，原来彭大刀放这暗炮是深思熟虑过的，和资内部统一了口径的。修养不便说话，为啥？为啥当了国家主席指挥更不便说话？按大刀的说法，之前老毛当主席，应该闭嘴，至少少说话嘛。仲尼、老龟陈犯过错误不能说？丫们嘴被人拿封条给封了？朱德意见少，哈哈，这位是个逍遥派。林妹妹不说话，那是在围观。小平同志自然不便多说，因为仲尼大哥都闭嘴了嘛。）

他还说，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正是这后一部分内容，使毛泽东十分生气，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哈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留给彭大刀自己恐怕更合适吧？）

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信的过程中，许多人同意彭的意见，例如，张闻天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

（懦夫张真是善解人意，丫应该掌握了传说中的读心术了吧？难道不应是怎么说的比怎么想的重要，怎么做的比怎么说的重要么？）

后来被通知上山参加会议的黄克诚，在比较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也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黄军头及时站队。）

会议中出现的这些情况，再联系到当时党内外的一些尖锐意见，以及赫鲁晓夫在波兰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公开批评，使毛泽东感到非常不安。

（彭大刀和苏修头子赫秃子不谋而合。赫秃子鞭了斯大林的尸，彭大刀这是要拆毛委员的台，更准确来说，是拆无的台。其实，要拆无台的岂止是彭大刀呢？仲尼们不是一直在拆着么？只是大刀历来投机，跳得比较欢。神马击杀袁王兄弟，神马表演百团大战，诸如此类，无不是投机取巧，形左实右。这次也是眼见仲尼们搅屎得力，老毛妥协退守，因此准备来个锦上添花，日后同享富贵。大刀这通搞，老毛能舒坦才怪了。）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全体会议，讲了一番话，尖锐地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他说：“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最后那一句，事实上是又一次点了周恩来和陈云，并且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了。这个讲话引起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大刀自己都说了跟仲尼们是一伙的了，老毛自然要把这两件事扯一块儿。丫们斗争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嘛。既然如此，那当然要绑一起批判。）

周恩来紧抓指标落实的问题，也遭到一些人的指责，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

（哈哈，又是无名无姓的“一些人”。从前面的内容来看，这“一些人”至少包括华东的无先锋。）

会后，周恩来又把计委、经委的负责人留下来，开了个小会，要大家讨论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些主张，以便在大会结束前向大家交代。周恩来在会上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的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

（仲尼说了几句大实话嘛。第一，老毛的讲话不都是命令，好多是征询意见性的，大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思考，再加以执行。这木有错嘛。但是，咋个思考执行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第二，大家要多让主席说话嘛，这样体现我们的民主做风，至于具体该怎么做，执行部门都在我们掌握中，你们还不知道么？第三，不能让主席搞独裁嘛，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我们都不站在他一边，他一个人啥也裁不了嘛。）

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哈哈，原来没有多少调查研究。那之前说的那么多数据都是咋出来的呢？）

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周恩来最初并不认为有多大问题，更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引起那样大的一场政治风波。

（哈哈，仲尼自己也是这样的意见嘛。仲尼们也是要看一看彭大刀出手后风向如何，以便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周恩来认为，首先要满足生产的需要，要减就减基建。他说“只有这么多米，只能做这么多饭。这样调整的结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厂血淋淋地下来，那没有办法。如果现在还不下决心，将来赤字一定出现。因为将来工业的欠款都是要转到财政上的，现在已经看出这个情况了，如果还不解决，就有点犯罪的样子。所以，非当机立断不可。”

（仲尼们心心念念的就是赤字，千万别有赤字啊，有了赤字就不得了了。另外，仲尼为毛不说说到底有多少米呢？现有资源是否充分利用了呢？五十斤米本来可以做一百斤饭，但各种瞎指挥、各种浪费，结果只做了五十斤；于是在仲尼看来，五十斤米只能做五十斤饭。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因为事实上确实只做出五十斤饭嘛。老毛说要做一百斤。这就是夸大主观能动性，无视客观事实嘛。）

周恩来谈到这些情况时，彭德怀在一旁说：“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恩来回答说：“你不晓得，开始讲，好像我这净是诉苦的事情，误会成为泄气就不好。”“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那么一通，应该谨慎吸取教训嘛。今年你代替我了。”通过这番话，人们不难理解，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哈哈，仲尼表示，压力山大，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还是不说为妙。大刀想

投机，那正好帮仲尼们试试水探探风。“今年你代替我了”，哈哈。大刀得偿所愿。）

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关于一封信的评论”，这封信是六月九日由原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后调任东北协作区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写给毛泽东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经济建设中的种种问题，认为“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巨大，但同时‘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却有所抬头。”

毛泽东在对这封信的批语中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说：“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同志们并没有摇摆，一直是站稳了走资的立场。一有左出现，同志们便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老毛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你们锱铢必较，我们也就睚眦必报。）

周恩来怎样面对这种突然变化的形势呢？七月二十六日下午，他召集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座谈会。经历过“反冒进”受到严厉批评的周恩来这时坚持两点：一点是在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

（哈哈，还是得主场作战，只有在自己家里才能畅所欲言。）

当时，会议已经被“左”的情绪笼罩的气氛下，周恩来这样提出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容易的。正如一位参加会议者所评论的：“周恩来是当家人，他不能空谈总路线正确，空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在庐山自始至终务实。他知道北京来的人的心理，着急的是今年指标如何落实，如何完成。他对此是一直不安的，也可以说是忧心如焚的。这篇讲话，言词之间，可以见到内心的矛盾。值此批斗升级，对事又对人之际，他一方面要保卫总路线，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另一方面要保证工作正常进行。既要务虚，又要务实。要正视困难，又不能为困难吓倒，他已感到即将出现他不愿出现的巨大风暴，要大家把工作做好。”

（哈哈，师爷引了一段李老逼的回忆。李老逼虽然痛恨老毛，满嘴谣言；但是这段话还是比较中肯的嘛。我们号召，不要因人废言。比如，李老逼就说，仲尼才是当家人。老毛就是空谈总路线，空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具体落实和执行，还是得仲尼来干，因为执行部门都是仲尼的人嘛。国务院仲尼当家嘛。老毛没有那么多无先锋来执行他的路线，那就只能谈谈路线了。当然，无的力量也是在斗争中冒出来的，无的阶级基础也是逐渐在壮大。说老毛一直是光杆司令，单打独斗，那也是胡说八道。老毛只有站出来斗争，才会争取到战友嘛。坚持战斗，就是对潜在队友最好的召唤方式。李老逼又说，批斗升级，对事又对人，这也是实话嘛。哪有脱离了人的事，又哪里有脱离了事的人嘛。认识一个人，就是要看他说的话，做的事嘛。谁也不会在脑门上刻着叛徒、反革命等字样嘛。做错事，一次两次，那是认识问题。三次四次，屡犯不止，那就不是脑袋问题，而是屁股问题了嘛。要嘛就确实是能力问题。能力不行也得撤，屁股问题就更得斗了。李老逼又说，仲尼一方面要（口头上）保卫总路线，另一方面要保证（反冒进）工作正常进行。李老逼又说，仲尼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接下来将要出现的风暴，所以让大家把（保护自己的）工作做好。嗯，李老逼提供了准确信息。）

对一些临时被召上山汇报工作的人，周恩来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担心他们不明情况，说错话，受到冲击。袁宝华回忆：“那时我在冶金部工作，国务院通知我上山汇报全国钢材平衡情况。上山后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国务院各部门到会人员的会议，周恩来及时向我们讲了会议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打了招呼，使我们避免了在那样一个政治风浪中犯‘错误’。”

（老猿又把仲尼给卖了。这分明是在说，仲尼告诉他们少说实话，多捡老毛爱听的话来讲，如此才能保护自己，以免受冲击。哈哈，仲尼真是贴心啊。具体执行的资们都不说清楚情况，让老毛一个人在那抓瞎。高招啊。）

对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各部委一些负责人，周恩来、李先念指定他们立刻返回北京。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于是，我和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恩来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们。”

（前面是预防“犯错误”，这里是把已经“犯错误”的护送离开，避免遭受

毛恶人的打击。彭大刀是挂定了，也无所谓了，还是保住资的大局要紧。大哥如此仗义，让小弟们如何不感激涕零、生死相随。戎子和在这段回忆里不依然透露出对仲尼浓浓的感激之情么？利益捆绑，行为示范，周全照顾，积极拉拢。仲尼的反革命政工不可谓不出神入化，令人刮目。）

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计委、经委、建委负责人开会，对工业、基建、运输、财政、金融、粮食等工作做了全面安排。他特别指出，钢铁指标和基建项目过多，出现了一些不平衡，比例关系失调，所以要削下来。

（失调，失调；减削，减削。慢慢慢，砍砍砍。）

他说：“这个斗争过了关以后，大家应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不要互相埋怨，不要再做检讨，以后再不说了，就是要实干、苦干，再说空话了。”

（发言就是喊话：大家要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把走资事业发扬光大！我保证，大家团结一心，实干苦干，以后就再也不用做狗屁的检讨，说自己都不信的社会主义空话。）

毛泽东说，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为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开一个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方法是“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开，不好工作”。

（资人多势众，无势单力薄。老毛明知会上都是外交辞令（仲尼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发发牢骚。）

中共中央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先后两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大多数时间是毛泽东讲话，批判彭德怀。他谈到彭德怀的历史情况，特别是谈到一些关键时期的情况时，彭德怀进行了解释。周恩来讲很少，只是在插话中，批评彭德怀骄傲。

（老毛只能逮住彭大刀不放，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老毛认识到，

以现有的力量，只有把握拿下彭大刀，资的大局暂时还破不了。仲尼继续外交辞令，小骂大帮忙。)

七月十七日刚刚上山的林彪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说彭德怀有“野心”，并指责他的那封信是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林彪的“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老毛孤军奋战已久，突然冒出林彪这员大将上纲上线，批判大刀，自然是喜出望外，要将林妹妹收入麾下。)

常委会决定，中央全会的任务就是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斗争的对象不仅仅是彭德怀，而且包括支持他意见的人，如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

(干掉了一批大刀的支持者，主要是老军头们，由此几乎平掉军中一个山头。从中获益最大的当然是林妹妹了，在军中少了一票劲敌。当然，竹叶青等也是乐见大刀垮台，这样他们的力量就越发重要了。失了彭大刀，仲尼们日后在军中的力量主要就来自竹叶青们。之后的历史表明，竹叶青是可靠的，为扫除四人立下汗马功劳。所以仲尼们并没有怎么出力去保彭大刀，首先是吃不准大刀是否真的可靠，其次是即便大刀可靠，但老毛等集中打击大刀，如果出手相救，很有可能救人不成，自己反被拉下水。还是选择围观比较妥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庐山会议上这场反右倾的斗争，毛泽东作出影响深远的错误结论。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这就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到了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的高度。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后一个决议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才公开发表，全会还通过了《关

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并根据周恩来等“算账”的结果，调整了一九五九年的经济指标，钢产量调整为一千二百万吨。

（这个结论当然是很准确的，及时指明了今后主要的斗争方向。但具体该如何斗争，斗争结果又如何，那都要取决于资无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经验。经济指标上还是根据仲尼们“算账”的结果加以调整，他们并没有遭受实质性的打击。无得到了虚，资得到了实。）

纵观此战，一开始资顺着之前的路子继续推进在两个领域的搅屎活动。然后半路杀出个投机资分子彭大刀。由于大刀历史不干净，屎点比较多比较明显，所以老毛逮住机会，准备断掉资阵营的大刀。仲尼们见保彭无望，便弃了彭大刀，保护其余人。斗争结果，彭大刀等一干军头下岗。老毛也由此得出阶级矛盾为主的结论，阶级斗争为纲的方略呼之欲出。但仲尼们还是成功压制了重工和公社的进程。林妹妹这个最大的受益者此时还没有暴露，成为毛的利用对象，同时也为无埋下了隐患。这更加表明，阶级斗争不是口号，具体行动中分清敌友的困难性和重要性。庐山会议后的资无斗争，主战场依然是重工和人民公社。这是后面一篇文将要论述的内容。

第九章 对战大跃进 3

前文说到，庐山会议，彭大刀等一干军头下岗。老毛也由此得出阶级矛盾为主的结论。但仲尼们还是成功压制了重工和公社的进程。庐山会议后，丫们继续积极地在这两方面搅屎。本文要叙述的是仲尼们在六零年的兴资灭无活动，以及无先锋在应对上的失误。这个失误增加了无日后的斗争难度。

庐山会议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新的“大跃进”的高潮，许多人头脑再度发热。一些人指责八届六中全会以来对生产指标的调整是不对的，甚至说：“反右反早一点可以不调整。”对这些言论和思想，周恩来多次提出批评。他指出：“调整指标是必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调整指标同反右倾是两回事，要区别开来。”

（这又是哪些不代表群众要求的积极分子瞎说的大实话。仲尼当然是要批评的。这“一些人”，让仲尼看到，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战友，无先锋的力量在上升。）

最初拟定庐山会议的议程时，毛泽东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读书，他说：“不要整年整月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这个愿望由于会议后期错误地批判彭德怀而没有能够实现。一九六〇年初，毛泽东再一次号召全党开展读书活动。

（毛作为无的战士，已经清醒的意识到身边的新民主主义的同路人渐行渐远了，要求他们跟上，问题是他们跟上了吗？读书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之一，屁股的问题主要还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

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发言中主要谈过渡时期的问题。他说：中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时期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任务是两句话，“把革命进行到底”，“生产力不断提高”。

（哈哈，总结得好啊。啥叫“把革命进行到底”呢？难道不正是要不断革命生产关系么？仲尼这一路是怎么做的呢？难道不正是妨碍了生产关系的革命么？啥叫“生产力不断提高”呢？资本主义生产力提不提高呢？封建社会生产力提不提高呢？哪怕奴隶社会，生产力也不是停止不前的吧？更何况，仲尼一路压制重工业，阻碍农业集体化，这哪里又是发展生产力呢？哦，或许可以叫龟速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说：“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前后贯穿起来看，至于整理毛泽东思想，要靠秀才，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的党的领导人来总结。”

（仲尼没有看错人，要说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的就是矮子了。神马农村包围城市，神马分化瓦解敌人，神马团结拉拢中间派，神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难道矮子不是活学活用到改革开放的反革命大业当中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么？）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他提出，在议论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中央和地方都不要打得太满”。谈到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时，毛泽东说：“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

（资搅屎成功，毛再次妥协退守。但毛并未一退到底，而是计划留些余地，但要努力在年度中超过。这才是老毛说的主动权。）

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一次把主动权拿过来”。他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

（仲尼顺势降低指标，但不提年度中超越的事。仲尼理解主动权就是主动砍，主动降，而不是主动在年度中超越。）

会上，大家都很赞成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刘少奇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邓小平也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

（降低指标，皆大欢喜。）

中苏关系的破裂，许多重点建设项目因撤退苏联专家而陷于停顿或半停顿，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原有安排。

（这本身难道不是前期完全依赖苏联专家而没有积极学习，加速培养自己的工业人才所导致的后果么？弱弱地问一句，谁在主抓苏联援助的大型项目咧？再问一句，仲尼说的作为建设事业支柱的那些高知们在干啥呢？）

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粮食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大减

产，情况更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

（只是公社干部的事么？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在干啥咧？）

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以来的瞎指挥和对粮食产量的虚报、浮夸和估产过高。

（谁在瞎指挥呢？又是谁在虚报，谁在浮夸？有木有个主体？“大跃进”可不是一个人哦，总不能说“大跃进”在瞎指挥，“大跃进”在虚报浮夸吧？然后老毛主张搞大跃进，于是就成了老毛瞎指挥、虚报、浮夸，于是老毛是粮食紧张的罪魁，于是饿死人都怪老毛。嗯，这推理，杠杠的。哎，我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可是仲尼先生由于有外宾在场而对某公社亩产十多万斤标语采取了容忍的画面哦。）

另一个原因是，一九五九年起连续两年的严重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这个原因，右逼认为可以选择性无视。）

一九六〇年粮食出口收购计划是一百亿斤，而到五月底只能完成三十多亿斤，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很被动。

（粮食既然如此紧缺，却还念念不忘出口，这个，嗯，仲尼说了，信用很重要。）

周恩来在调粮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到江西视察，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请他吃饭。当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时，周恩来笑着说：“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个条件！”刘俊秀问：“有什么条件？”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刘俊秀说：“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十二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三亿斤就是十五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

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刘俊秀痛快地答应了。

（仲尼大智慧，杯酒调粮食。）

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向香港市场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运输工作却一天都没有中断，并且得到逐步的改善。为解决货物运输中出现的问题，减少损失，铁道部和外贸部想了很多办法。一九六二年八月，开通了由武汉江岸车站直达深圳北站的向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七五一次首列快运列车。当这趟列车开行一百列之际，周恩来指示铁道部和外贸部，“由上海、南京至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根据这一指示，十二月十一日，铁道部又增开了分别由上海新龙华和郑州北站始发的七五三次和七五五次快车。至此，向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体系正式建立。三十多年来，这三趟快车成为保证港澳供应的“生命线”。

（哈哈，千万不要忘记桶蘸！鲜活冷冻商品大老远运到港澳，请问港澳工人吃得起来么？那么这些玩意儿是给谁吃呢？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港澳工人的敌人们嘛。嗯，宁愿让自己国内的无产阶级饿着肚子，也不能让港澳的各路老板们缺了好吃的。这就是仲尼先生伟大的桶蘸精神！一方面抱怨基建开支大，一方面又增开列车给港澳老板们送货，这，就是仲尼先生伟大的桶蘸精神！）

有一次，周恩来到长春视察，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要求向地方的管理员讲了，他们硬是不听，结果，邓颖超只好自己出面，把管理员找来，将亲笔写的山珍海味不准吃，肉、蛋和油炸的东西少吃，一切按标准做的种种规定交给他。做饭的老厨师看到后十分激动地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厨师，做了这么多年的菜，没少为大官掌勺。只见过点名要山珍海味的，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这不准吃、那不准做的。”

（嘿嘿，琢磨琢磨，老师傅话里有话哦，粉仲尼的同时，顺带揭了当时的官场风气。丫们难道不是早早就脱离群众了么？至于仲尼，私德的高洁完全不影响其资立场的坚定嘛。相反，这对心眼实的群众反倒更具有迷惑性。）

在困难时期，周恩来特别注意严肃党纪。一九六〇年十月，调运粮食最紧张的时候，青海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五万斤鱼。周恩来得报告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严厉批评。

（查一下时任青海省委书记，哦，是老龟命高峰。果不其然，丫在文革中受到鸟早饭派的迫害。要不怎么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早饭派们的打击还是很准确滴。省内的群众饥肠辘辘，缺粮少米，丫们还想着上供五万斤鱼。高老龟挺过了文革，不过没过多久就挂逼了。再查查文革期间受冲击的各省书记，没有一个不是在这期间就欠了大笔血债的。再比如河南吴芝圃，入围三年灾害五书记。河南群众歌谣为证：“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何止不少，简直太大了。嗯，这只龟死在了文革期间。太不容易了，终于有一个死在鸟文革。早饭派的迫害准度很靠谱，但是力度着实令人不敢恭维啊。多少老龟都在文革期间轻轻松松去了三高，改开后继续趴在群众身上吸了几十年血！再如，同为五书记的四川李井泉，嗯，这位之前已经提过，是谋杀柯庆施同志的嫌犯。在文革中也是迫害早饭派的走资死硬分子。还有同为五书记的，大名鼎鼎的安徽曾希圣。这位是包产到户大推手，修养邓挫好基友。其他的老龟，就不一一介绍了。要说这帮子老龟到底该对三年灾害负上多少责任，咱只能说，再多都不会过。各省群众，恨不得将丫们抽皮剥筋。还有神马比阶级仇更深更烈更难平的么？）

会后，周恩来指定习仲勋、齐燕铭、汪东兴、童小鹏、赖祖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通知规定：一、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二、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三、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员下去视察工作或参观时，当地负责人不要迎送，严禁组织群众迎送，生活招待应当从简，并按标准收费、收粮票；四、精简会议；五、除必要的宿舍外，今后七年内，一律不准新建招待所和其他非生产性设施。

（嘿嘿，这不正说明资先锋们迎来送往已蔚然成风，嗨皮得很么？）

对广大群众，周恩来十分关怀。当时，煤矿工人的粮食定量从六十斤降低到四十五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粮，其他副食品，如肉、酒、糖等供应也很少，工人的体力大大下降，难以担负繁重的劳动，严重影响煤炭生产。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多次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开会，反复进行研究，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井下工人的粮食定量恢复到每月六十斤，而且粗粮、细粮进行适当搭配，便于工人下井带干粮。

（哈哈，对群众中的矿工的关怀就是恢复每月六十斤粮食的定量。）

周恩来听说东北生活用煤得不到保障，公共场所和一些室内气温很低，有些演员手脚冻得麻木而影响演出时，除了要求有关部门保证正常的煤炭运输外，还亲自动员沈阳军区用汽车帮助运落地煤和煤泥，保证他们生活用煤的最低需要。

（对群众中的演员的关怀方式是亲自动用军车雪中送煤，嗯，演员们不能冻着，祖国的文艺可都靠你们呢。）

周恩来还给予知识分子特别的关心，他请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起草了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的有关报告，尽可能使他们多获得一些营养。

（嗯，对同被视为工人阶级分子的高干高知果然关怀备至，特别强调要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嗯，高知们营养要跟上，他们可是用脑的。至于矿工，六十斤粮食果腹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只是干苦力的嘛！哈哈，同样是工人阶级，差别咋这么大咧？）

周恩来深深感到，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还远远谈不上过关，这个基础还十分脆弱，他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指出：“不大跃进，不能摆脱落后，但是，我们对大跃进的规模还未摸透，我们对农业过关估计容易了。”

（哈哈，工业不能大跃进，农业必须大跃进。仲尼先森不精分么？）

“农业过关总要使农业能够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有一定数量的化肥配合土肥来增产，基本上完成水利”，“这都是基本上的要求，要基本上实现”。

（哈哈，机械化，那么机械哪里来呢？难道是农民们造出来的？一定数量的化肥，那么化肥又是哪里来呢？难道是农民们造出来的？水利，嗯，这个农民们倒是能弄出来。但是，他们难道真得永远肩挑手提、一锤一凿地干水利么？这种原始的劳动工具难道不正应该被先进的机械取代，解放劳动力么？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正需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大发展才有可能么？）

近两年国民经济产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周恩来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自然灾害……其次是缺乏经验……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其中主要是执行政策不力。

（哈哈，仲尼也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执行不力。那么，谁们在执行呢？执行的什么呢？）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国内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确定和落实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全会前，先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形成《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在《紧急指示信》十二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若干具体政策：一、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分两步走。二、社员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有适当发展。社员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从《紧急指示信》规定的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三、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之前已经指出，对公社性质的认定，应该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这意味着要有一部分的商品生产，但商品生产的基本单位依然是集体，而不是个人。而且集体所有制也不是一直维持，止步不前，而是要

根据实际情况往全民方向推进。至于仲尼说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那是要严加限制滴。一边是农民饿肚子，一边又要活跃农村市场。咱不免要问：市场的物资都是哪儿来的呢？）

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

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包括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他在会上再一次强调领导干部亲自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痛切地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老毛旧话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几年陷入走资派们制造的重重迷雾之中，老毛感觉很不爽。一个战略出来，就被搅得一团糟。当然，我们不认为是走资派们品行有多坏，而是认为出于其阶级立场丫们必然要选择相应的政策方针、执行方式乃至具体行为。因此，这个困境并不是简单重提调查就能解决的。而只能通过实质性的阶级斗争来解决。话说回来，阶级斗争也是体现为具体的行为、执行方式一直到政策方针。没有神马抽象的阶级斗争。比如要获取相对可靠的基本信息，就得下基层，寻找自己的群众基础，和相应的搅屎资作或明或暗的斗争。）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根据几个调查组汇报的情况，鲜明地提出农村人民公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一个是大队内部各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两个问题，问题极大，不彻底解决，不可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在公社内部还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周恩来提出：要压缩一批城市人口回乡，这项工作应该立即着手准备，而且要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去做。我们希望从今年麦收开始到明年，争取在一年半

的时间内压缩一千万以上的人口回乡，这对于减少城市的粮食压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会起很好的作用。减人这条措施十分重要，正如陈云所说：“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哈哈，工人呆在城市里都是吃闲饭的。倒是各路知识分子，各级领导干部们作用巨大，不可或缺，要好吃好喝伺候着。不把这么些工人弄走，怎么保持高知高干们的生活质量呢？）

在伯延公社调查过程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社员们要周恩来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周恩来认为：“既然摸点，总要摸出个情况来，总要给他一点合理的保证。”所以，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同志说：“我可以保证。”

（小农表示，要带着自留地的尾巴万万年。仲尼表示，咱可以保证。估计这位社员的自留地得是一块肥田吧？至于那些贫瘠的土地，小农们是不感兴趣滴，分了这些地作为自留地的，岂不是要和留了肥田的产生矛盾？如此一来，一个公社内部仅仅因为自留地问题就会产生分化，又如何谈进一步的革命呢？仲尼们真是时刻不忘搅屎咧。在仲尼们看来，那些社员的呼声代表了农民群众的要求。至于其他人，对不起，被代表了。纵观历史，在集体所有制下，贫瘠的土地，甚至之前根本无法耕种的山地也都被生产队改造为粮食产量还算不错的耕地，这是单干模式想都不敢想的。）

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继续举行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手工业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由于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取消了分配问题上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强调严格评工计分，并且针对大家关注的食堂问题提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

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修正草案还对保障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原则。

（农业六十条是资无斗争的阶段性的结果，双方各有得失。无方所得是守住了集体所有制的线，而资方所得则是在其中塞入很多搅屎的空档，给小生产留下比较大的自由。因此，在走资的保护下，小生产得以保持生生不息，从集体内部搅屎，在集体外部搅屎，阻碍着集体的进一步推进。）

在调整政策的过程中，周恩来十分重视总结经验。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庐山会议以来，由于我们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倾和工作上的问题混淆起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事求是，所以尽管想搞好一点，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一切都搞全民化，动摇了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得罪了小资产阶级。

（哈哈，仲尼心心念念的还是小资产阶级啊。仲尼表示，一定要善待小资产阶级啊。嗯，仲尼说出了资的心里话：社会主义改造得罪了小资产阶级，不得了啦，天要塌啦。）

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中央主要是书记处和政府部门，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应负主要责任，“有些事情发生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查，摸得不细，心里没底。”

（没有调查，心理没底，哈哈，那么之前的“周密”计算是咋进行的呢？）

周恩来提出，要解决问题，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他说：人如何压下去呢？“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三年压两千万人，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陈云十分赞成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看来仲尼陈云才是苏拉密教主的精神导师嘛。丫们认为城市工人压迫农村劳动人民。不过仲尼的方向好像正好搞反了。按苏教主的想法，应该取消城市工人的福利，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要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往城市发展。仲尼甩了好重一记耳光。仲尼们看来，工人在城市就是浪费粮食；至于高知高干们，那生

活质量是不能减滴。再说，农村劳动力如此充足，丫们竟然认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不足。粮食产量上不去，显然不是因为劳动力投入不足，而主要就是因为机械、水利、种子、化肥等各方面的条件还没上去，而这些，又是因为相关的工业发展没有上去嘛。丫们把工人往农村赶是毫不手软。但老毛要动高干高知们的时候，丫们又觉得老毛惨无人道。哈哈，丫们屁股坐哪边，不是很明显么？）

周恩来连夜主持起草出《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六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九条办法逐一作了说明。经过讨论，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城镇减人，必须迅速造成声势。各级党委首先是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亲自领导，进行充分政治动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分期进行。只许办好，不许搞乱。

二、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特殊需要加人的必须得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批准。减少城镇人口，必须同压缩城市粮食销量结合进行。

三、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首先是大中城市的人口，清查黑人黑户，做到人粮相符。

六、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今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

（农村来的工人要哭，没有户口的要哭，继续在城市的普通工人也要哭。究竟谁在笑呢？无先锋完全可以发动工人，联合农民，抵制前两条。农村转到城市的工人无疑会支持无先锋，农民肯定也赞成自由流动，如此联合，力量自然不容小觑。第三条也很坑爹，啥叫黑人黑户？这帮子人，不还是农村转到城市的工人么？第六条则是搅城市普工的屎。因此，无先锋如果够敏锐的话，是可以发动这一大批群众来对资搅屎的。然而并没有，至少从相关屎料里没有看到。可以说，无先锋没有借此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在此是错失了一个良机。这样就增加了日后斗争的难度了。这给无先锋的教训就是：一定要上盯走资，下盯群众；积极准备，时机出现，发动群众，投入斗争。）

经过这半年多的努力，由于农业的情况基本摸清，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策，农村情况开始出现好转，但是，工业方面的困难却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在一九

六一年初调整本年度国民经济时，重工业尽管放慢了发展速度，但主要指标仍维持在上年的过高水平上，没有坚决降下来，而实际产值却在显著下降（到今年年底，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点六）。这样，中共中央将调整工作的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

（在资产阶级搅屎之下，重工业遭到重挫，而实际上就是无的力量遭到了重挫。小农的状况出现好转，小资产阶级也终于不受委屈鸟。）

周恩来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发展的规模主要是由农业状况决定的，他说：“要使工业发展，我们就要认识工农业的关系，城乡关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拿马克思的话说，集中的一句话，就是农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

（哈哈，一句话，农村能供多少商品粮，决定了工业的发展规模，这就是大总理对工农关系的理解！还把老马抬出来，合着老马的话就是圣经咧？且不说这话是不是老马说的，就算是老马说的，简单地套用到这时的历史情境，那也是谬论。无需神马烦难的推理，单从粮食产量的变化和工业规模的发展对比来说，即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工业规模也是大大发展的。河蟹粮食总产量从 83 年至 92 年增幅很小，人均口粮则几乎没有变化，但工业规模却是大大发展了。纵观新中国至今的历史数据，人均粮食从来没有达到过仲尼所预想的五百公斤。把城市商品粮作为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岂不是太幼稚了？更何况，仲尼还没有考虑社会形态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无专政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将取消粮食的商品属性，而作为基本生活品按需分配。到时候更不会有神马商品粮咧。仲尼咋不说说工人消耗了多少粮食，高干高知小资们又消耗了多少生活资料呢？即便承认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也应该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农业提供机械、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从而实现农业的大生产，大大促进粮食生产，而不是固守乃至鼓励农业小生产的现状，把劳动力都束缚在这落后的生产方式中。）

在周恩来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努力查清了几年来粮食生产的实际底数：一九五八年不是五千亿斤，而是四千亿斤；一九五九年不是五千一百亿斤，而是

三千四百亿斤；一九六〇年不是三千七百亿斤，而是二千八百七十亿斤；一九六一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一百六十亿斤。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困难的症结就暴露得十分清楚了：那种超越实际可能而在工业建设方面不断铺摊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是难以为继的。

（哈哈，当初的数据是咋来的呢？要不是老毛觉得郁闷，往下压，这盖子还不知道啥时候揭开来呢。这不分明是走资派们掌握的经济行政部门不作为么？仲尼自己不也承认看见作假不吭声么？至于铺摊子，难道不正是走资投机分子们的乱作为么？各种搅屎，不作为，乱作为，最后把帽子扣到工业指标上，进而扣到大跃进的整体战略上。走资先锋们玩这套可真是老练嘞。如果说当时是出于资屁股而自然这么做的话，那么在后来的党屎和老龟命们的回忆录中还这么说，就纯粹是有意歪曲和掩饰了。当然，歪曲和掩饰，说到底也还是由丫们的资屁股决定的。）

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一九六一年计划作了很大幅度的调整，削减了一半上下：基本建设投资从一百六十七亿元降为八十七亿元，钢产量从一千九百亿吨降为八百五十亿吨。

（这个计划对工业来说只能用一个词来描述：腰斩。）

他还多次出席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落实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这个方针得到毛泽东和与会者的赞同。

（资成功搅屎，老毛选择妥协。）

纵观这一阶段，资不断搅屎，释放迷雾，制造困难，然后以此为由压制重工。在农业领域则是鼓励小生产，保留小农尾巴，造成公社内部社员之间的分化，削弱公社稳定性。并且以粮食不足为由缩减工人数量，延缓工人工资的提高，给农民进城制造重重困难。这本是无先锋可以利用来反击资搅屎的一次良机。但我们没有看到无先锋在这方面的斗争活动。随后的历史表明，这次失误给接下来无的

斗争增加了困难。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

第十章 对战大跃进 完

在前面几轮搅屎之后，资的活动取得了成效。在六二年，资先锋接着持续发力，节节逼近。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五月会议，资势力一路高歌猛进，成排山倒海之势。兴资灭无，如火如荼。搅屎重工业，挖掘无根基；下岗大分流，摧残无力量；培植小生产，分化农集体；维护高知干，巩固资屏障。老毛见状，主动出击，在八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起反击，并在九月底八届十中全会上延续攻势。但无的力量还是不足，资搅屎坚决，老毛被迫妥协。结果，经济形势还是向着资制定的方向推进。

经过一九六一年的调整，国民经济主要比例日益失调的势头初步得到控制。农业生产开始稳住了，粮食产量略有回升。但是，重工业生产从这一年起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倒退，钢产量从上一年的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吨下降到八百多万吨，比一九五九年的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还要少得多，煤产量下降到二亿八千多万吨，下降的势头还在继续。轻工业总产值又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二十一点六。

（资搅屎成功，重工大倒退。）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原有的生产能力本来没有那么大，由于前几年生产指标太高，机器设备超负荷运转，加上长期失修，损坏严重。工人吃不饱饭，体力不足，劳动积极性也下降。钢铁减产的另一个原因是煤炭供应不足，全国粮食供应的状况仍很紧张，能够用来供应城市的更是严重不足。

（哈哈，资掌控的各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计划执行混乱，各种浪费，却把帽子扣到指标上。工人吃不饱饭，体力不足，高知高干们的小日子可是滋润的很，这难道不正是仲尼们的功劳么？）

在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内形势作了这样的概括：“形势已在好转，农村先于城市；困难仍然很多，城市大

过农村。”他提出一九六二年进行全面调整的八项任务，主要是：一、放下架子，也就是说，要对那种架子大而又不实在、原料和物资都不够的经济结构坚决调整，实行关停并转。

（中央直属的架子最大，但却实在，无奈陈薄们的效率令人堪忧，少慢差费得很烈。按仲尼的意思，是关呢，还是不关呢？）

二、坚决减人。周恩来指出，这回要下狠心，首先是各部，按工交、基建、财贸、农林水、行政各个口子摸，非要把综合生产能力跟减人的数目定下来不可。

（真是对无咬牙切齿，对资无微不至。在这一点上，仲尼可真是棺材朱的榜样咧。关停并转，下岗分流。差别是，仲尼的分流，多半是回农村搞小生产。而棺材朱的分流，则是留在城市搞小生产，女工们则还可以选择卖肉，所谓女工不流泪，走进夜总会。小生产蒸蒸日上，然后就鼓吹经济回升鸟。其结果都是资的群众基础迅速壮大，无的力量遭受摧残，阶级矛盾大大加剧。）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范围比以往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都广泛，除了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外，还包括地委、县委以及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这次会议又称为“七千人大会”。

（大小干部都招呼来，资的无的都来，到会上斗一斗。）

会议分两个阶段，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九日是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并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政治报告。

刘少奇在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的同时，又作了一个口头报告。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怎样产生的呢？刘少奇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去年回湖南调查时，问那里的农民，产生困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经过调查后，赞成这个意见。

（哈哈，著名的三七分原来最早出自淳朴的农民之口。是啊，七分人祸，哪个阶级的人呢？资队伍的人呢，还是无队伍的人呢？）

本来，大会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后准备结束，但是，由于在会议当中许多人纷纷提出意见，还有不少人心里的话没有都讲出来，因此，毛泽东决定延长会议的时间，并且决定后一个阶段的会主要是“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

（资准备在七千人大会通过丫们的结论之后就散席，结果无不干了，毛及时地站了出来。）

连续三天听取会议的发言。在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和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听后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

（哈哈，地方干部出来放炮。炮口对准各省委书记以及中央。要不是无自己争取，老毛站台，恐怕有没有这个放炮的机会就很难说咯。之前一路看过来，中央有多少资，多少无，省委书记中有多少资，多少无，大伙应该清楚得很了。谁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谁搞得党群关系紧张，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么？仲尼们难道之前就没有听到反映这些情况的声音么？但是，要捂住，因为这些都是自己人嘛。）

二月三日，周恩来在福建小组会上发表讲话，他集中地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作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

（哈哈，还记得矮子对马列毛思想的总结么？没错，就是实事求是。哎，邓挫真是一点创新都没有，全是照搬照抄他大哥的东西。马列毛思想的核心竟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是神马实事求是！还有比这更庸俗、更缺乏无产阶级立场的解释么？资产阶级就不讲实事求是？地主老财不讲实事求

是？无产阶级的实事求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资产阶级的实事求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专政事业，地主阶级的实事求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压迫事业。毛泽东思想的解释，还真是离不开仲尼这些党的领导们呢。）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分析国内形势时曾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过了，但是，目前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对这种分析，与会的许多代表感到很不理解。二月七日，周恩来在大会的闭幕会上讲话，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

（资成功压倒了无，最困难的时候当然是过去了。压制了重工业，摧残了无力量，释放了小生产，建立了新秩序。但还存在相当严重的困难，因为阶级矛盾日益激烈。“许多代表感到很不理解”，这要么是认识糊涂而真不理解的资代表，要么是认清形势而表示不满的无先锋。仲尼坚定地站在资一边，出来答疑解惑。再说一次，发言就是喊话。仲尼的解释，就是释放资的信号。）

周恩来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问题。他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势把工人菊花残的决绝之心难道不是跃然于言表么？这，就是信号！）

（这之后，仲尼着手安抚知识分子。各种优待，各种保护。具体情形在“仲尼搅屎录（二）知识分子问题”一文里已有说明，此处就不再赘述了。总之，仲尼在困难时期也是不忘善待知识分子们的，而他之对待工人，我们只能呵呵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因为在大会上难以具体地部署经济调整工作。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这是继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通常被称为“西楼会议”。讨论中发现，当年财政预算中实际上存在五十亿元的赤字，经济形势的困难程度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得多。刘少奇和陈云在会上相继发言，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出席了西楼会议，完全同意刘少奇和陈云的意见，并建议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

在西楼会议期间，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精简问题。会议对国务院九个口子的精简工作做了安排。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精简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安置，要“先减人，再拆庙，以免人心惶惶”。他建议成立中央精简小组，由杨尚昆主持，并表示自己要直接过问这项工作。

（资们表示七千人大会不过瘾，要时刻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意思是阶级矛盾还很激烈，胜负尚难料，因此要“采取果断措施”，也就是继续兴资灭无，否则“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要向着无的方向走。仲尼表示完全同意，“并建议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也就是说，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幅度兴资灭无。邓挫专门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精简问题，也就是灭无问题。正所谓四大金刚齐聚首，势叫无产难出头。仲尼强调，要“先减人，再拆庙”，也就是先把工人弄走，再把厂子拆掉，哈哈，这个是不是很有当代老板的风范呢？“以免人心惶惶”，就是避免激怒工人，发生混乱。仲尼建议成立中央精简小组，由杨老龟主持，并表示自己要直接过问这项工作。嗯，很有魄力，决心已定。）

西楼会议后，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迫切地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后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刘少奇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和李先念担任副组长。成员有：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二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连续开会，讨论国民经济形势，认真地摆问题。陈云认为，由于情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长期计划很难提出比较切实的指标，甚至画个“框框”也很难。他建议准备在七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不要先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还是分析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摆情况，把问题搞清楚。讨论方针，研究措施，把思想统一起来。

（统一好资内部思想，做好内部团结工作，然后再把资意志上升为全党意志。尚方宝剑在手，自然应者云集。）

在三月七日的讨论中，陈云提出，对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他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一旁插话说：“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伤筋动骨，表明了资先锋对无进攻之决心。对无，就是要伤筋动骨。把无搞残，挖其墙角，这样资路线才能顺利推进。陈老龟凶恶之心溢于言表，仲尼拍手称好。）

本来，在一九六二年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大幅度调整，是周恩来最先向中央提出来的。但那时还是想慢慢转弯。这时，周恩来说：“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究竟怎样转弯呢？周恩来提出八点办法。其中第一点是“经济计划工作要从以工业交通为重点转到以农业、市场为重点”。

（要伤筋动骨，自然不能不大幅调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能循序渐进地搞改良，要大跃退，要采取反革命的办法。下定决心砍砍砍，坚定不移退退退。重点从工业转到农业，从生产转到流通，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面目暴露无遗。）

周恩来还提出一九六二年调整的十项任务：一、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二、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三、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四、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五、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定资金；六、改善市场的供应状况；七、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八、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九、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十、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

（第一项任务，收买小农；第二项任务，收买干部、城市小资和在岗工人；第三项任务，削弱工业基础；第四项任务，削减工人力量；第五项任务，准备资的计划；第六项任务，同第二项；第七项任务，削弱国内经济积累；第八项任务，

重用知识分子；第九项任务，给国民经济裹上小脚；第十项任务，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灭无兴资任务明确，灭无兴资立场坚定。）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过去什么都要变成全民的，有些东西搞得过急了。有些可单独开业的医生应该允许他单独开业，有些家庭教师可以给人家教一点书过去都搞成全民的就搞死了。”谈到一部分青年不能升学时，他说：“不能升学可以补课嘛，可以由私人办补习学校、函授学校。”他鼓励大家多想办法，但这些办法必须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这是仲尼在青联四届一次会议中的讲话。他再次提出了他的经济纲领，看看，和 80 年代的资产阶级改革思路有区别吗，不正是摸着这个石头摸到现在吗？说改开的先锋是仲尼为首，确实是名至实归。开私人诊所、办补习学校，哈哈，小资小生产嗨皮得很。无语先生快来跪拜你祖师爷吧。）

四月上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对一九六二年的计划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尽可能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尽可能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来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了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

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企业要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报告中提出了几项重大措施：第一，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规模。同时，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和支援农业、满足市场、出口需要的工业项目继续建设并按时投产。第二，除砍掉十多万个小高炉外，对那些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和那些原料、燃料、动力供应不上或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第三，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一千万人，其中精简职工八百五十万人，以缓和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报告起草完成后，周恩来派薛暮桥送到杭州向陈云报告，得到他的同意。

（继续坚定不移地行走在农轻重的资路线上。）

有些下面的厂长议论说：“调整减人，举棋不定，思想混乱，工作被动”，造成企业职工的思想动荡不安。这说明，要把中央的决心化为全党的决心，使大家都接受，还需要一个艰苦的说服过程。

（企业职工思想动荡不安，被下岗，搞分流，工人能淡定才怪了。但是，资的意志坚不可摧，资的方向不能动摇，工人咋想不重要，再痛苦也要接受。像那首歌唱的：“大不了从头再来。”）

在二月份，中共中央曾经发出一个通知，决定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加上一九六一年已精简的城镇人口一千万人，一共是三千万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三千万，哈哈，资先锋真是眼疾手快、心狠手辣，谈笑间工人灰飞过半。棺材朱没少看仲尼传吧？）

周恩来强调这件事情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谨慎。

一个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

（时机紧迫，不能犹豫。出了乱子，专政伺候。仲尼表示，穷逼们翻不起多大浪。）

薄一波回忆道：“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又比西楼会议深入了一步。有的同志在会上表示，面对困难，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把国民经济调整好。”

（前有伤筋动骨，此又来个“毒蛇噬臂，壮士断腕”。资先锋队灭无之心不

可谓不决绝，不可谓不险恶。邓挫搞改开，不也说要杀开一条血路么？谁的血呢？）

五月会议在扭转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中，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这时，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落实。为了帮助各地制定和落实具体的调整方案。周恩来和几个副总理分别到各省、市去督促和指导工作，同他们一起共商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削减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等各项任务的落实措施。

（继续推进灭无方针。）

东北是重工业区，大型企业多，情况复杂，是困难特别严重的地方。周恩来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李富春负责华东，李先念负责中南，薄一波留在北京，除处理日常工作外，负责华北的调整工作。

（关键战场亲自出马，仲尼不愧为走资老大。嘿嘿，棺材朱下手最重的不也是东北么？肿么可以这么巧合？）

在东北地区最困难的任务是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当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需要精简职工二百万，压缩城市人口三百万。这个问题牵涉到职工生活，家属安排以及到农村后的住房等问题，都很棘手。再加上为确保鞍钢、大庆油田等重点大企业的充分开工，对于地方所属的几千个小型企业要分别情况实行关、停、并、转，一些地方同志总是舍不得。

他说，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

（仲尼表示，在灭无兴资的长征路上，同志们要舍得丢掉坛坛罐罐，不然包袱太重，影响前进。）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内围绕农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营管理方式更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都支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生产责任制”的办法。刘少奇说，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

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从东北回到北京。他多次去看望病中的陈云，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陈云讲到，可以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尽快恢复。周恩来赞成陈云的意见。

（小农经济是资的天然盟友，走资先锋们当然举双手赞成，举双腿支持。）

毛泽东也注意到关于农村经营管理问题上出现的这场争论，但他错误地认为邓子恢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是刮“单干风”，搞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他又把这个时期在干部甄别过程中彭德怀申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问题所写的八万言书看作“翻案风”，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资无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对抗性的矛盾。资在中央明显占了上风，这和资无在基层的力量对比上是相呼应的。）

八月六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邓小平在开始时本来宣布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是：一、关于农村工作……二、关于财贸工作……三、城市工作……

但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根本改变了原定的会议议题。他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一、现在究竟还有没有阶级，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二、对国际国内形势问题究竟怎么看？三、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天天在那里专政，天天在那里斗无产阶级，“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这个意见。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这些批评所针对的，显然包括中央常委和中央财经小组前一阶段对形势的分析和工作的部署。

（邓挫试图继续搅屎，巩固他们已经取得的战绩，老毛作为无的战士及时反击，直指问题根本：阶级！

- 1.你们这帮子人明着不提阶级斗争了，实际干的就是灭无兴资的勾当嘛；
- 2.你们把国际形势吹得那么恐怖，实际就是要转移矛盾，搞乱无的思想，加

强对工人的专政嘛；把国内困难吹得那么可怕，也是一样的效果

3.社会主义依然又阶级矛盾嘛，资土壤随时在，无专政随时受到侵蚀嘛）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刘少奇对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形势的估计作了检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承认对形势估计“过分”了。八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心小组会并谈了他对问题的认识。周恩来说：“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六个矛盾都很重要，很适时，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过去如此，将来相当长时期如此。”对形势问题，周恩来认为：“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更多了一些，这对党内发生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

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周恩来说：“主席一讲，就把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头脑清醒了。讲到责任田，我们就要注意，就要分析，都有了警惕。”

（修养明确说是漆黑一团，而不是神马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至于包产到户，表面上警惕，实际上继续纵容。）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错误的结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问题从现在就讲起，要年年讲，月月讲。这对全党的认识和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种“左”的偏差，从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发展得愈来愈严重，为后来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会议通过了七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几个文件，还对邓子恢、彭德怀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哈哈，师爷再一次把此处的提法和文革挂起了勾。没错，正是如此。阶级斗争为纲，是因为资产阶级月月在，无产阶级斗争自然要天天讲。不时刻进行斗争，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在隐忍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老毛再次主动出击，冲到了战斗的第一线。）

在当时的气氛下，他批评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思想，但认为这是“认识上的错误”。

（哈哈，在仲尼看来，一切都是认识问题。加强学习，斗私批修，参禅念佛，一切就好了，腾云驾雾来到鸟共产主义。）

根据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周恩来提醒大家：“反右的时候还要防‘左’。”他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把反右斗争搞到底下，搞到群众中去了。这回就吸取这个教训，反右防‘左’，不搞运动。”

（多么耳熟的调调，这不正是设计师百般强调，随时挂在嘴上的么？果然是仲尼的好弟弟。要反右，但主要是防左。明着反右，暗中反左。还不能搞运动！阶级斗争竟然不是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而是几个人之间的宫廷政斗？！其实仲尼心里是清楚的，必须把防左搞到群众中去，小资和“小资”们必须积极参与防左。至于反右，那就老毛一个人搞好了。小资和准小资们难道不正是走资派广泛的群众基础么？“小资”们难道不正是被走资派领导的小资群众运动中被裹挟进来，甚至主动参与到防左，也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么？）

整个会议的“左”的气氛对工作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提出的意见，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且提出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所以，八届十中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计划进行的。

（无的反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修养们的极力搅屎下，老毛妥协了。还说出神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这样的滥调。难道有脱离阶级斗争的工作？难道阶级斗争不就是工作本身？既然阶级斗争贯穿于一切活动之中，那就无所谓平行的问题嘛。“按照原来计划”，就是按照资们制定的计划。）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又经过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大家对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形势逐步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下定了必须退够的决心，坚持不懈地采取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使农村生产关系退到比较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使整个经济工作逐步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资节节逼近，无做了一下抵抗之后被迫妥协，经济形势依然按着资制定的方向推进。）

纵观这一段斗争。资先锋接着前一段的攻势，持续发力，节节逼近。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五月会议，资势力一路高歌猛进，成排山倒海之势。兴资灭无唱大鼓，进展如火又如荼。一边搅屎重工业，挖掘无根基；一边下岗大分流，摧残无力量；一手培植小生产，分化农集体；一手维护高知干，巩固资屏障。刀光剑影，攻势凌厉。老毛见状，主动出击，在八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起反击，并在九月底八届十中全会上延续攻势。尤其对准邓子恢搞单干进行攻击，算是有一点收效。重提彭大刀，也是意在敲打走资派。但无的力量还是不足，资搅屎坚毅果决，老毛被迫妥协。结果，经济大势还是向着资制定的方向推进。无的成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续篇 三反五反与四清

搅完大跃进的屎之后，仲尼们马不停蹄，又搅起了三五计划和四清运动的屎。老毛明确提出三五以基础工业为根本，并促使农业和国防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战略布局。但仲尼则继续阳奉阴违，把执行的重心放在农业上。不仅如此，在农业的发展上，仲尼们一如既往地鼓励小生产，以小生产来从内外部瓦解集体农业，阻碍集体农业巩固壮大，并进一步向全民农业推进。四清运动，作为一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说是文革的序曲。正是修养们在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的表演，让老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前老毛就不止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矛盾是阶级矛盾，资本主义有复辟的危险，但始终没有以主动号召先锋队投入并组织广泛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在四清运动中，老毛明确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派。阶级斗争一直在进行着，老毛只是选择了站队，提炼出斗争的基本方向、斗争对象等，并积极参与到对走资派的斗争当中。仲尼用两手来搅四清的屎，一手是拿生产压阶级斗争，一手是用捞干部维护资力量。这两手，在文革中用得更加娴熟，更加气派。

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在会前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老毛对经济布局、比例的看法明显要高远得多。基础工业是根本，农业和国防的发展水平最终取决于基础工业的发展水平。仲尼一贯的顺序是农轻重，但却“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二者全然不同嘛，咋就能“十分赞成”呢？）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讲到这些问题。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备战。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

（拨清波可真能搅屎。老毛明明说的是优先发展基础工业，这是大本。到了资的嘴里，就变成加强农业生产是第一，只是在加强农业的同时，也就是说，农业得到优先保障的前提下，顺便搞搞工业。这把屎搅得未免太粗糙了。）

在紧张部署三线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国家着手进行工业改革。

这项工作实际上从一九六三年夏天就开始了。当时，周恩来强调：“我们要搞一套制度出来”，“人治不行的，第一还是法治”。这年八月，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邓小平主持下，成立了由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等参加的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发现十几年来因循沿袭的工业管理体制存在不少弊端，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成为这次工业改革的重要内容。

（哈哈，要法治，不要人治。要抽象的法律法规，不要具体的阶级专政。要搞一套制度出来，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鸟。话说回来，照搬苏联的工业管理体制无疑是问题多多，确实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进。关键是要往哪个方向改，是往

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还是往相反的方向。显然，老毛为代表的无先锋是主张前者的，至于仲尼主张哪个方向，我们来看他具体主张如何。）

九月，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起草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其中提出通过试办“托拉斯”来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听取工业工作汇报时，充分肯定了这个意见。“托拉斯”最初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很高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它是产品相同的企业或生产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的联合经营的公司，是一种大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是否能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还需要一个调查研究 and 在实践中探索的过程。周恩来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一直很重视这个新生事物。他历来主张：首先要集中力量搞必要的和最需要的，什么都搞、分散力量是不行的。后来，他又对一位外宾谈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想法，认为可以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的某些组织形式来办社会主义的企业，完全按照经济方法来管理，不要靠行政命令。

（哈哈，资产阶级师爷孙冶方日后可是大力阐发了这个“完全按照经济方法来管理”是咋回事。很不幸，在文革期间孙师爷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很幸运，改开后孙师爷又被戴上了经济学家的冠冕。以孙师爷为名的经济学奖也成为河蟹国内经济学的头号大奖。集中力量搞，谁都不反对嘛，苏联也是集中力量搞的嘛。倒是仲尼们集中力量直管的企业一直是少慢差费的路子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当然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走群众路线，搞民主集中嘛。群众路线是民主，各级计划是集中，二者要统一嘛，没有前者，就是空计划瞎指挥，没有后者，就是无政府乱自治。走资分子一嗅到垄断的威严，就兴奋不已，真可谓臭味相投。仲尼和铁托，一个在这极，一个在那极，貌似对立，从根本来说就是一体两面，全是反社会主义，哈哈。关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的问题，还需单独写文来谈，这个问题也是被左逼右逼们搅得一塌糊涂，成了大粪坑。）

他说：“用政府名义管理工厂，不利于经营管理。行政命令太多，层次太多，一个中央部门和一个省的部门直接管到企业，单位太多，中间层次太多。我们有大小工业企业十万多个，这种管理方法不容易。相反，把它分散像南斯拉夫那样的自治，分散主义就会大大发展。即使不采取南斯拉夫那样在外汇和市场上自由

的资本主义方法，也危险，不利于计划经济。凡是分散主义都不利于计划经济。怎么办呢？我们想采取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但是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公司，按行业自上而下领导。这样完全按照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核算，改善方法，不要行政命令。

（无产阶级专政，自然是要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管理工厂。既然如此，不用政府名义管，用神马管呢？问题显然不在于以神马名义管，而是实际上以社会主义的原则管，还是以资本主义的原则管。以神马原则管，难道不正是屁股决定的么？更往前一步，不是由不同屁股的人之间激烈的斗争所决定的么？可见，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又如何可以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公司呢？仲尼这是要走一个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么？列宁论垄断资本主义的时候留下个大坑，傻逼希法亭把这坑挖的更大，斯大林也掉进坑里没爬出来。仲尼们更是拍脑袋就干。）

为了促进试办托拉斯的进程，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周恩来两次主持会议，讨论国家经委党组起草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在六月二十九日会上，周恩来强调：“要把托拉斯的发展前途写明。成立托拉斯以后，随着托拉斯的职能的扩大，部的机构就要缩小，行政部门只留少数人就够了。将来有些专业部如石油部，现有三至四个大基地，可改变为大企业，这样，石油部本身就可以变成总托拉斯。”他还指出：托拉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来办，按照经济规律要求来管理。公司的企业职能逐步扩大，行政的职能要缩小，行政的职能转化为经济的职能。将来地方上同托拉斯的关系也要由行政关系为主转化为经济关系为主。

（啥叫行政关系，啥又叫经济关系呢？）

“组织托拉斯就是要解决行政管理和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对目前的一些官僚主义的办法来个革命，吸取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长处。当然，不是追求利润的办法，而是用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办法，来发展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发展生产力。”

（原来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仲尼也没说搞托拉斯那么就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嘛。）

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案）》提出，在一九六四年内先试办十二个托拉斯，其中全国性的九个，地区性的三个。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份文件，指出这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要求中央主管部门和各级党委要充分重视这件事情，集中力量首先把这一批试办的托拉斯搞好。在以后一年多的实践中，这项重大改革遇到不少问题，也积累了许多经验。

（哈哈，仲尼们搞半天制度设计，就搞出个“托拉斯”来，真可谓满眼尽是屎啊。嗯，确实是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可谓是邓挫改革的先声。）

可惜的是，这个探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中断。薄一波评论道：“当年中央决定试办托拉斯，期望以此为契机，逐步改变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是有远见卓识之举。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为指导这一改革付出了很大努力。‘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它，使经济又回到老路上去，实在是一大憾事。”

（哈哈，文革真是罪大恶极，让河蟹晚生了十年。要受这十年的苦难才横空出世，老龟命表示痛心疾首啊。好在邓挫门们篡权成功，继承仲尼的大志，完成了仲尼没有完成的事业。）

毛泽东对计划工作一直不满意，要求改变计划方法。在一九六四年九十月间召开过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等成立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小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哈哈，老毛对仲尼们的计划工作一直不满意啊。为神马不满意呢？）

九月二日，国家计委拟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提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提纲强调在“三五”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否则就会犯方针性错误。提纲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意见，把“三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总投资额定为八百五十亿元。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将这个提纲提交会议讨论，得到通过。周恩来评价说：“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落实一些，更实际一些。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他还提出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

（仲尼搅得好屎。先是压缩总投资。然后偷偷地在评价中改变计划内容的顺序。把农业提上来排在第一位，而把基础工业放到最后。国防倒是放在了第二。老毛此时也把外部矛盾当主要矛盾，把国防摆在第一位，这是个错误判断，而且极容易被搅屎。抗美援朝的胜利基本保证了中国不可能受到直接的战争打击，外部矛盾更不可能成为主要矛盾。更何况，紧接着中国就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更不可能遭到直接的战争威胁。只要是阶级社会，那么，任何时候，国内的阶级矛盾都是最主要的矛盾。即便是以前搞抗日桶蘸，那也只是表面上搞，暗地里还不照样相互厮杀？这一点在《扯扯西安事变的淡》里指出过。阶级利益的截然对立，决定了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桶蘸。真心搞桶蘸，必然会对本阶级阶级利益造成损害。老毛把国防提到第一位，实际上给仲尼们一个搅屎的机会，借机把基础工业压在了后面。而无论如何，基础工业都应该是排在首位的。正如之前已经说过的，基础工业是根本。即便是发生战争，基础工业也能迅速转为军用。而在平时，基础工业也是国防的前提。更何况，基础工业放在首位，也并不就停止国防的建设。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国防嘛。不过，不论怎么说，老毛也不会认

为应该把基础工业放到后面，而把农业提到首位。这分明是仲尼的路子。)

不久，由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没有形成正式的“三五”计划。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根据这时确定的基本方针去做的。

(仲尼还是偷偷往计划里塞了好多屎，之后几年就是按这个计划走的。文革对此形成了冲击，但也没有完全改变。)

周恩来走到哪里，谈起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总是把农业摆在最前面。有些干部在讨论他的讲话时提出，国防和农业哪一个放在第一位？有的干部还问：是否应该修改“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把以国防建设为中心改为“大力发展农业，突出国防”？周恩来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

(哈哈，时刻不忘宣传农业第一。资的“有些干部”想把三五指导方针直接改为农业第一，顺带搞搞国防。还是仲尼聪明，明面上已经过了的，就不要去动了，宣传执行的时候按着资的方针做就是了。仲尼很明白，指导方针啥的，木有阶级力量的推动来保证，就是个空话嘛。)

怎样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说：“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小型为主，大型为辅；集体为主，全民为辅；自办为主，中央帮助；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他强调：“要抓紧、抓快、抓狠，要全民办农业。县、公社都要抓农业，每一个季节都不能耽搁。”

(仲尼指示，要全民办农业，但少办全民农业，这屎搅的；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嘛；明显是迫切需要工业化支撑全民农业，把集体农民转为农业工人，并且解放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嘛。仲尼一方面要全民办农业，一方面又不要办全民农业，这是要小农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万古长青的节奏啊。封建社会差不多就是全民办农业哦，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办农业嘛。而且封建社会也不办全民农业，也是办的小农小生产嘛。仲尼这是要重走封建路么？还好地主已被剿灭。不然咖啡帝封建资本主义的帽子还真适合给仲尼戴嘞。)

周恩来还提出在农村中“非搞副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养猪多的，除了出口、外调，还要自己销一些”。

（嗯，多搞小生产，多种经营，活跃农村市场哦。）

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为了今后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一定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首先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依然坚持农轻重的资路线。仲尼对老毛的“十分赞成”看来十分都是假的嘛。）

中共中央在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正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运动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他引用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会议形成一个“十七条”的文件（后来补充修改为“二十三条”，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下发），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不久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依据。会上有人提出，可以在必要时抽出一部分生产时间，甚至于停工一个时期集中搞运动。周恩来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有些关键性的东西不好停的，就还要有一部分人生产，炉子一下冷却了，就不行了，各种生产里都有这个问题。”

（拿生产搅屎。有两个问题仲尼清楚得很：1.斗争无处不在，生产领域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领域；2.生产时间工人分处各地，难以串联，不利于组织，容易

被控制，被各个击破。把工人的活动限制在各自的生产过程，使走资派最容易进行分化瓦解，打击迫害有早饭精神的工人。当然，觉悟工人依然会以各种方式反抗。但无先锋队若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对走资派给以有力的打击，则基层工人早饭的条件会大大恶化。这位提出在必要时间抽出一部分生产时间集中搞运动的，无疑是无的先锋。仲尼针锋相对，坚决反对。是啊，看到这么犀利的敌人，不犀利地反击，肿么好意思呢？我们将会看到，拿生产来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屎，将贯穿仲尼此后的全部日子，直至挂逼。老毛则一阵见血指出，社教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既然是一场群众运动，那么走资派当然也会发动丫们的群众，如此，运动必然就成为对立阶级在各自先锋队领导下的激烈斗争。文革只是把这个斗争公开化，从而以更广泛而激烈的方式展开。）

在“四清”运动中，农村许多社队对干部开展了过火的斗争。被誉为农业战线一面红旗的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受到冲击。他就站出来保护陈永贵。

（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是如何在四清运动中搅屎，从思想上行动上把社教性质的四清运动变成打击基层干部的“群众运动”。修养理解的依靠群众，就是依靠他领头的中央到县级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队。修养理解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是集中工作队上万号人到一个县去歼灭基层干部。修养理解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作队四清和基层四不清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离群众运动自然是十万八千里了，至于离社会主义运动，那就更远了。前面一路看下来，我们清楚地知道仲尼和修养是一路的。但是从搅屎技巧上来说，修养和仲尼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修养跳出来整下面的干部，纯属得罪人，搅自己的基础。又跳得那么高，谁都知道摆明了是跟老毛对着干。仲尼就隐蔽很多，比如拿生产说事，这就能把水搅浑，实际上以资压无。再比如，暗中掺沙子。被修养挤掉的人，也都给捞回来。当然，这个被仲尼捞回来的陈永贵是个另类，是个顽固不化的文革派。这也是仲尼少有的的一笔亏本买卖。相较而言，扶植吴桂贤就划算多了。至于文革期间保护打捞老干部，那就更不必说了，功劳大大滴。）

那时，农村的“四清”运动正以很大的声势在发展，各地负责人都以相当多

的精力投入这个运动。针对这种状况，周恩来强调不要光搞“四清”而误了生产。他说，阶级调查搞上十天半月就行了。他批评一个负责干部蹲在一个地方搞阶级调查，半年没有搞完，结果把别的工作都耽误了。

（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在搅屎**。阶级斗争贯穿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生产活动离不开生产关系，总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生产关系也不是静止的，而总是随着阶级斗争而变化，总是或朝这个方向，或朝那个方向变化。一种生产关系确立后，也总是要由阶级斗争来加以维护。抓革命和促生产本就是一回事，革命在生产领域的首要体现就是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发展，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方向上促进。经济主义简单地把促生产理解为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只是产量的提高。由此就把抓革命，促生产歪曲为政治运动服务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因而就把效率或产量的提高定为首要目的。这难道不就是邓挫“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声么？周邓一家亲，决非虚言。且不论这种认识没有理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认识只是泛泛地提效率，而不提为了哪个阶级的问题。虽然不提，但实际上在资生产关系下，效率的提高只能意味着壮大资的力量，损害无的力量。这才是经济主义的要害！）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三五计划，老毛主动出击，划定指导方针：基础工业为本，国防和农业跟进。仲尼在宣传和执行中**搅屎**，缩减投资总额，并改为农业第一；农业政策上压集体，抑全民，鼓励小生产，宣传农市场。四清运动，老毛依然主动出击，划定运动性质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拎出主要矛盾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指出斗争对象为党内走资派。仲尼还是在宣传和执行中**搅屎**，一手拿生产压阶级斗争，一手用捞干部维护资力量。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走资势力的日益猖獗，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是不可避免。激烈的矛盾只能用激烈的斗争来解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后那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历时十年，当然，它就是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仲尼们，当然会接着战斗。先锋怎可旁观呢？